

第一章

交换的工具

一眼可以看出，经济分成两大领域：生产和消费。一切从生产开始和再开始，一切以消费结束和归于消灭。马克思^①写道：“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蒲鲁东说过，干活和吃饭是人唯一的、显而易见的目的，他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但在两大领域之间，有一个第三者挤了进来，它像河流一样细长和活跃，也一眼便可认出：交换，或者说，市场经济：在本书探讨的几个世纪里，市场经济既不完备，又不连贯，但已带有强制性，肯定还具有革命性。在顽固地趋向习惯的平衡、稍有偏离便立即纠正的整体中，市场经济是变化和革新层出不穷的区域。马克思称之为流通领域^②，我深信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当然，生理学上的流通一词被借用到经济学^③来以后，包括着太多的含义。杜尔哥全集的出版商 G. 席勒^④说过，杜尔哥曾想编写一部《流通论》，书中谈的是银行、约翰·劳体系、信贷、汇兑、贸易以及奢侈，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几乎全部经济活动。就在今天，市场经济这个词不也具有有一种广义，远远超出流通和交换的普通范畴^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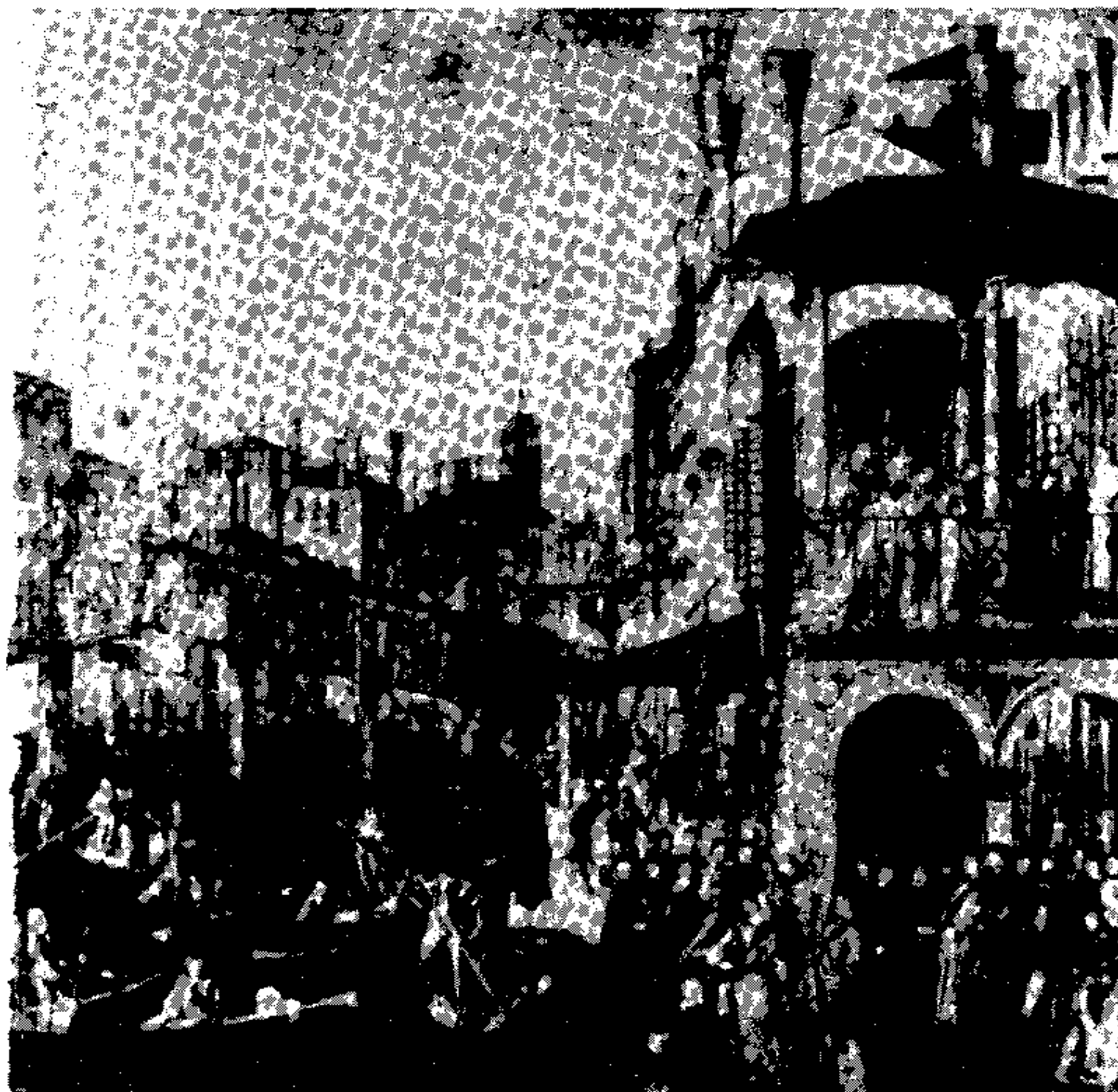
可见有三个领域。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谈的主要是消费。我们在后面几章将研究流通。有关生产的困难问题留到最后去讲^⑥。这倒不是有意同马克思或蒲鲁东唱反调，不承认生产问题

是主要的问题。历史学家是逆向观察者，他很难从生产这个模糊、不易辨别和尚未盘点清楚的领域着手。相反，流通具有便于观察的优点。那里的一切都在躁动，各种运动暴露无遗。市场的噪音肯定要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去。从阿雷蒂诺曾纵情眺望日常景色^⑦的同一个窗口，我能找出1530年前后威尼斯里亚托广场上的批发商和零售商，这样说毫不夸张；我还能进入1688年间乃至更早以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并且不会迷失方向，我几乎要说，即使做几笔投机生意也不致出太多差错。乔治·古尔维奇或许立即会反驳说，便于观察的事物很可能是无足轻重或次要的事物。我虽然不敢如古尔维奇一样肯定，但我认为，杜尔哥在研究当时整个经济时优先注意流通，不可能全盘皆错。何况资本主义的产生与交换有密切联系，这一点难道是无足轻重的吗？最后，生产要求分工，分工迫使人们进行交换。

谁又真的想缩小市场的作用呢？即使初级市场也是供求双方求助他人的理想地点，否则就不存在普通含义上的经济，而只有一种自给自足或非经济的“封闭型”生活。市场是一种解放，一种开放，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冒出水面。人的活动，人们交换的剩余产品从这个狭窄的缺口慢慢通过，其困难程度最初不亚于圣经故事所说的骆驼从针眼通过。针眼后来扩大了，增多了。这一演变过程的终端将是“市场遍布的社会”。^⑧我说的是在过程的终端，也就是说市场的普及相当缓慢，并视地区而异，从不在相同的时间，或以相同的方式实现。市场的历史可见并不是简单的线状发展。传统的、古老的市场与近代的、现代的市场相毗邻。即使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找到和汇集有代表性的形象确实不难，但要确切规定其相互关系却殊非易事，甚至在得天独厚的欧洲也不例外。

这个潜在困难之所以产生，难道也是因为把十五至十八世纪这段时间选作观察范围还嫌不够长？理想的观察范围理应扩展到

迄今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市场。这是蔑视一切传统观念的卡尔·波拉尼^⑨曾经涉足的广阔领域。但是把古巴比伦的所谓市场、今天特罗布里恩群岛原始人的交换渠道、中世纪和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市场笼统地放在一起说明，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我对此不敢完全



威尼斯里亚托桥。卡帕乔奥作画，1494年。

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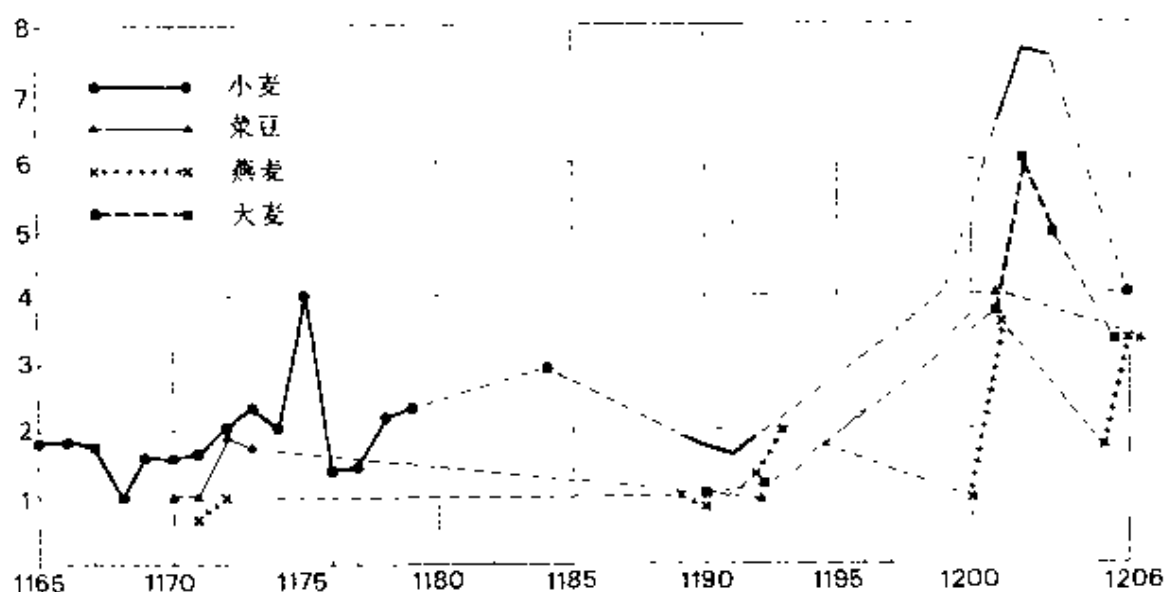
总之，我们将不是一开始就立即进行一般性解释。我们将以描绘为起点。首先描绘欧洲，这是我们了解较多的基本见证人。然后再描绘欧洲以外的地区，因为任何描绘如果不是真正围绕世界一周，就不能随后开始解释。

欧洲：交换下限的齿轮

现在首先来看欧洲。早在十五世纪以前，欧洲已消灭了最古老的交换形式。据我们的了解或猜测，从十二世纪起，价格便处在波动状态^⑧，这证明“近代”市场业已建立，有时能互相结合，构成初步的市场体系，组织起城市间的联系。其实，集市基本上设在城镇。乡村集市^⑨在十五世纪虽然已经存在，但为数极少，不值得重视。西方城市独吞了一切，使一切都屈服于它的法律、苛求和监督。集市变成了它的一个齿轮。^⑩

普通集市今昔相似

初级集市今天依然存在，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消灭。它们定期出现在城市的习惯场所，总是那么杂乱拥挤，喧嚷嚷嚷，冲鼻的香味与新鲜的食物比比皆是。以往的集市也大致如此：几块木板，一块防雨布，每个摊位都按事先确定的数字登记编号^⑪，并根据当局或地产主的要求交费；成群的顾客，众多收入甚微但忙忙碌碌的帮工；从搬嘴弄舌著称的剥豆类女人，代客剥青蛙皮（成筐的青蛙用骡驮到日内瓦^⑫和巴黎^⑬）和从事搬运、清扫和赶车的小工，私下兜售的小贩，继承父业而又喜欢吹毛求疵的市场管理员，二道商贩以及从衣著便可一眼认出的农民，物色便宜货的市民，串通起



1. 英格兰早期的物价波动

根据 D. L. 法默：“安茹王朝时代英格兰的某些价格波动”，《经济史杂志》，1956—1957 年，第 39 页。请注意继 1201 年歉收后，各种粮食的价格同时上涨

来(有钱人的说法)报假帐揩油(当时称作“捞外快”)^⑮的女仆,在集市售货的烤面包师傅,在街头和广场乱摆肉摊的屠户,批发商(经营鲜鱼、奶酪或黄油)^⑯,税吏等等。最后,到处堆着各种商品:黄油,蔬菜,奶酪,水果,水淋淋的鱼,野味,现买现割的肉,卖不出去的存书(其纸张用于货物包装)。^⑰此外,还有柴草、木料、羊毛、大麻、亚麻乃至土布从乡村运来出售。

初级集市之所以几百年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肯定因为它的简单朴实是无法超过的;容易腐烂、不宜存放的食品直接从附近的田园运来,自然十分新鲜。价格低廉也是个原因,初级集市是最直接、最透明和监督得最好的交换形式,那里进行的主要是“第一手”交易^⑱,避免了欺骗。或许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交换形式。布瓦洛的《行业志》(于 1270 年前后写成)^⑲说得好:“送食物来集

市出售,这才叫公道合理,货物的优劣和价格的贵贱,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集市出售的东西,无论贫富,大家都能购买”。用德语的说法,这是“手握着手、眼对着眼贸易”^⑳;这是直接的交换:当场拍板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难得出现赊帐的事^㉑。这种古老的交换形式在庞培、奥斯蒂亚或古罗马时代的提姆加德业已存在;再上溯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古希腊曾有集市,在古代中国及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也存在集市,交换在巴比伦出现尤早^㉒。欧洲人描绘了“邻近奇蒂特兰的特拉尔台戈”^㉓集市(墨西哥)的五彩缤纷以及“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黑非洲集市,那里的成交额虽然微不足道,但其秩序却令人赞叹^㉔。埃塞俄比亚市场起源之久,今天已无从查考。^㉕

城市和集市

城市通常每周有一至二次集市。为保障市场供应,乡村必须有生产和汇集食品的时间,并且能抽出部分人手去从事销售(主要是妇女)。当然,在大城市里,集市趋向于经常化,例如巴黎便是这样,虽然在原则上(事实上也往往如此)集市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举行。^㉖总之,间断也罢,连续也罢,城乡之间的这些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在已知的所有交换中占的份额最大。城市当局因此对集市的监督管理抓得很紧,这对它们是个紧要的问题。权力机构近在咫尺,处置迅速,密切注视着价格。在西西里,商贩的讨价只要超出定价一个“格拉诺”,就有可能被判处苦役!1611年7月2日,巴勒莫曾出现过这种情况。^㉗在沙托丹^㉘,烤面包师傅凡被三次抓住把柄,就得“如香肠一样捆绑结实,毫不宽贷地从货车上扔下”。这一惯例始于1417年,奥尔良家族的查理当时授予助理法官巡查面包铺的权利。面包商直到1602年才争取到取消这一刑罚。



巴黎的面包市和家禽市，奥古斯丁滨河大道，1670年前后。

监视和压制未能阻止集市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兴旺和膨胀，并且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在固定日期招徕顾客的集市是社会生活的天然中心。集市是人们会面、商量、骂街甚至打架的场所；是私下串通制造事端从而惊动官府的场所；是巡逻队难得动手干预（轻易不干预，每次干预总要闹出一场好戏）的场所^②；也是政治新闻和各种流言蜚语的传播场所。1534年，在诺福克郡费克纳姆集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亨利八世国王的行为和计划^③。年复一年，我们在哪个英格兰集市上听不到布道牧师激烈的言词？在场的群众对各种事业都能动心，甚至慈善事业。集市也是商讨家庭间或事务性契约的最好地点。我们从公证人卷宗中看到，“十五世纪在萨莱诺省的齐福尼，每逢集市，除出售食品、手工业品和土产品之外，土地买卖契约、长期租赁契约、馈赠证书、结婚证书、嫁奁证书的订立比例（比平时）较高。”^④集市使一切加快

节奏,甚至也合乎情理地使店铺的生意兴旺。例如,在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兰开斯特,店主威廉·斯图脱“每逢集市”,总要多请帮手。^⑳这大概是条普遍规律。除非店铺在开集市那几天遵命停业,这在不少城市也是常有的事。^㉑

集市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饱含哲理的俗谚足以为证。这里试举几个例子^㉒：“沉默寡言的审慎和体面除外,一切都在集市出售。”“买下没有上钩的鱼,到头来只会落得一场空。”谁不懂买卖的诀窍,“到集市上一学便会”。“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这等于说,也想着别人,因为集市上不会只剩下你孤身一人。一句意大利谚语说,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宁要集市上有朋友”。达荷美今天的民俗还认为抗拒市场的诱惑是明智的表现:“听到招揽生意的叫卖声,聪明人回答说:‘我的出帐不超过进帐’。”^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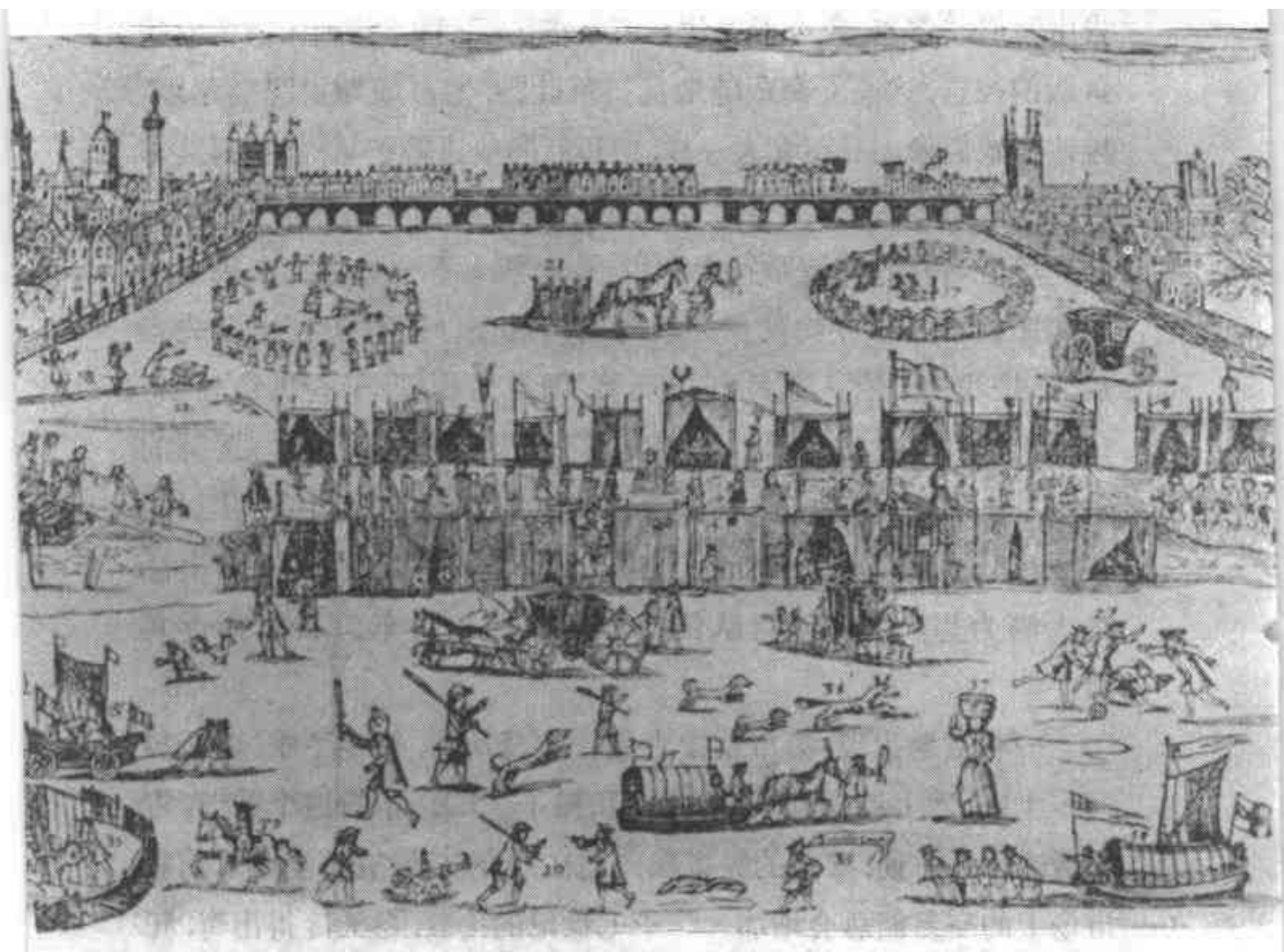
集市的增多和专门化

设在城市的集市与城市一起壮大。它们不但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扩大,以至过分狭窄的城区容纳不下。由于它们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步伐,它们的发展简直势不可挡,造成人群拥挤、垃圾遍地和交通堵塞,市政当局对此无可奈何。解决的办法或许是把集市迁往城门口、城墙外和市郊。开设新市场时就往往这么做,例如巴黎在圣安托尼关厢的圣贝尔纳广场(1643年3月2日),“在圣米歇尔门和护城壕之间,在唐费尔街和圣雅克门之间”(1660年10月)^㉔开设了新市场。但原在市中心的旧市场仍然保留;即使稍稍移动它们的位置也很不容易,如圣米歇尔桥的市场于1667年从桥上挪到桥头^㉕,半个世纪后穆夫塔尔街的市场挪到附近“主教公馆”院内(1718年5月)。^㉖新市场不取代旧市场。随着市区扩大,城墙的位置不断外移,因而原先规规矩矩沿墙设置的市场总有一天又回到城里,并且从此保留下来。

在巴黎,高等法院、市政长官和警察总监(从1667年开始)拼命想把集市控制在恰当界限内,但都是白费力气。1678年间,圣奥诺兰街无法通行,因为“在坎兹万肉店附近不按规定新开设了集市,逢到赶集的日子,乡下和城里的许多女商贩临街摆摊,妨碍交通,虽然这是巴黎过往行人最多的通道之一,理应畅通无阻”^⑩。明明是胡作非为,但又有什么办法?这里腾空一块地方,势必在别处又占上另一块地方。将近五十年过后,坎兹万的小市场仍留在原地,警官布吕塞尔于1714年6月28日在给夏特莱的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首先,我今天去坎兹万小市场买面包,接到了市民对鲭鱼贩的控告,这些女商贩随地乱扔鱼肚肠,把市场弄得腥臭不堪。应该让她们像剥豆荚女人一样,把鱼肚肠放进篮子里,然后再装车运走。”^⑪更令人吃惊的是:“油膘市”,每逢受难周,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名符其实地举行大型集市,巴黎人不论贫富都来采购火腿和肥肉。公平秤就设在大教堂的门廊下。人群为秤肉争先恐后,你推我挤。有人趁乱开个玩笑,闹点恶作剧,干些扒窃勾当。负责维持秩序的法兰西卫队的表现不比别人好,附近主宫医院的殡殓工放肆地逗笑取乐。^⑫尽管如此,格拉蒙骑士于1669年居然获准在“圣母院和宫岛之间”设立新市场。每逢星期六,广场上总是人满为患。宗教游行队伍或王后的四轮马车怎么能穿行其间?^⑬

一有空地出现,集市就去占领。在莫斯科,每年冬季,莫斯科河一上冻,冰上就摆开店铺、木棚和摊子。^⑭每年的这个季节,雪橇运输十分方便,宰杀的牲畜和肉类在户外自动结冻,圣诞节前后市场上的交易额总会增加。^⑮十七世纪的伦敦,冬天冷得出奇,狂欢活动能在封冻的河上举行,气氛尤其热烈:“在整个英格兰,狂欢活动从圣诞节一直延续到主显节前夕”。“临时搭起的小酒铺比比皆是”,当街烤着整扇的牛肉,西班牙葡萄酒和烧酒吸引全体居民,

甚至国王有时也亲自光临(1677年1月13日)。④但在1683年1月和2月,事情变得有点不妙。特大寒潮袭击了城市;在泰晤士河的出海口,大块浮冰险些把冻住的船只压个粉碎。粮食和商品不足,物价三倍、四倍地上涨,冰封雪阻的街道不能通行。城市的活动迁到河上,河面变成货车和客车的通衢大道,商人、摊贩和手工业者在那里搭盖棚屋。一个庞大的集市凭空冒了出来,其规模之大足以衡量首都人口之多;当时曾亲历其境的一位托斯卡纳人写道,该集市简直像是“巨型交易会”,“江湖骗子、小丑以及各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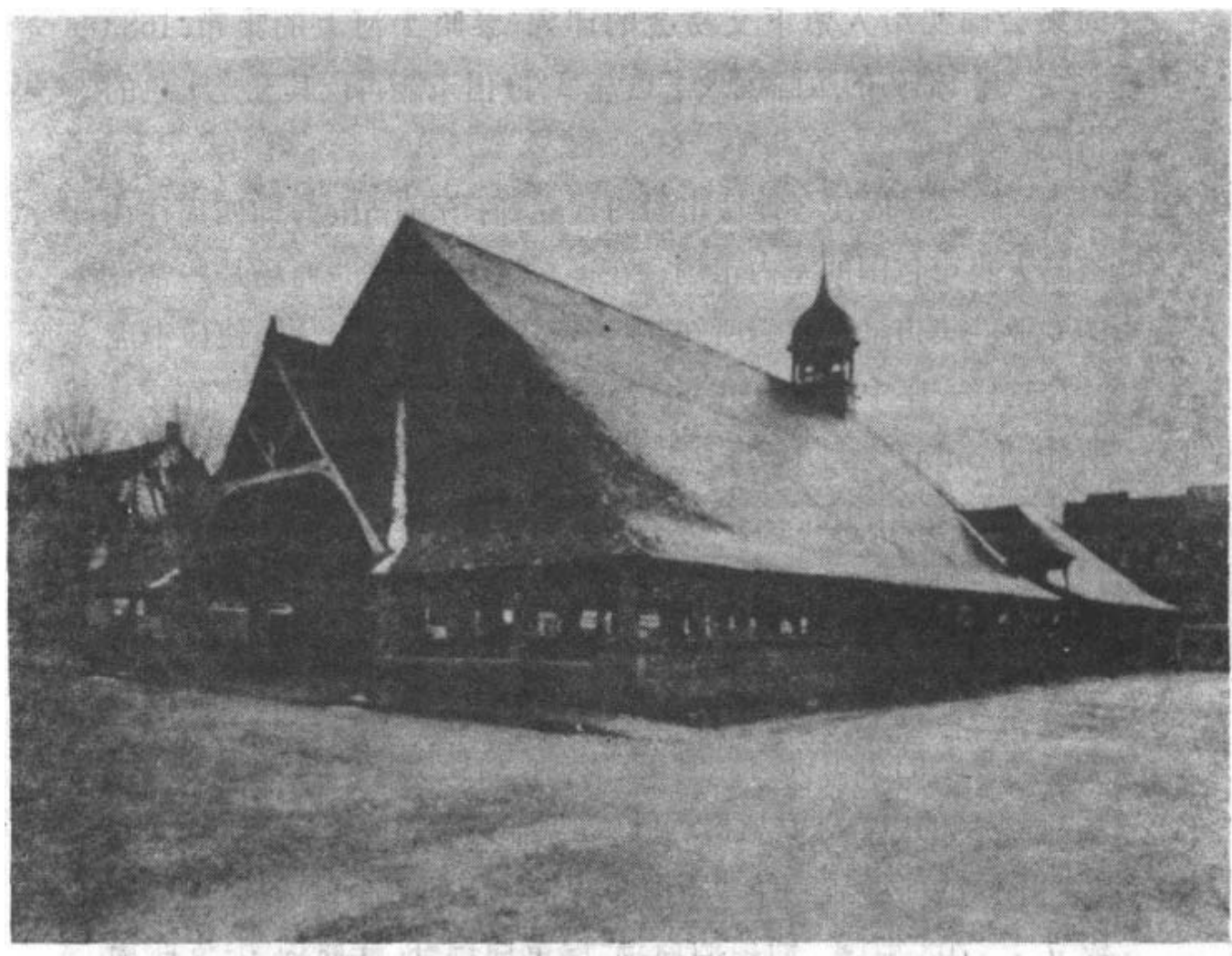


1683年泰晤士河上的集市。爱德华·鲁宾逊《英国最早的咖啡馆》一书中复制的这幅版画展现了在封冻河面上举行的集市场面。左侧为伦敦塔;画面后方为伦敦桥。

戏法和玩杂耍的”闻讯后纷纷赶来“挣几个子儿”。^{④7}这种不正常的集会确实给人留下交易会的印象(泰晤士河上的集市,1683年)。一幅拙劣的版画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未能再现其五光十色的俗趣。^{④8}

交换的扩展使各地城市纷纷建立“商场”(halle),即四周往往被露天集市包围的室内市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商场是些常设的专业性集市。据我们所知,呢绒商场数量极多。^{④9}即使像卡庞特拉这样一座中等城市也有自己的呢绒商场。^{⑤0}巴塞罗那在交易所(la Lonja)楼上开设了呢绒商场。^{⑤1}伦敦的勃莱克威尔商场^{⑤2}始建于1397年,1558年曾扩建,1666年毁于火灾,又于1672年重建,规模特别巨大。商场长时期内每周仅售货数天,于十八世纪变为每天营业,乡村呢绒商养成习惯把未售出的货物存在那里,以待下次交易。1666年前后,该商场已有固定的经纪人和职员,以及一整套复杂的组织机构。但在这以前,商场所在的贝辛霍尔街已是“商业区的中心”,其盛况远胜威尼斯的“条顿商馆”。^{⑤3}

不同的商场显然经营不同的货物。例如有小麦商场(图卢兹成立于1203年)^{⑤4}、葡萄酒商场、皮革商场、皮鞋商场、毛皮商场(德意志城市中有谷物商场、毛皮商场和皮鞋商场),在盛产珍贵染料的格尔利茨地区,甚至有菘蓝商场。^{⑤5}英格兰城镇于十六世纪往往由当地富商慷慨出资筹建许多名称不一的商场。^{⑤6}在十七世纪,毛线商场就设在亚眠市中心圣费尔曼·昂·卡斯蒂翁教堂的背后,离大集市或麦市只有几步路:手工工匠每天从商场购买所谓脱脂毛线,即“经梳理后脱脂并用纺车纺成的线”,这是附近乡村纺线工送往城市的产品。^{⑤7}同样,一字排开并有棚盖的肉摊群其实也是商场。例如,埃夫勒^{⑤8}和特鲁瓦^{⑤9}的肉市都设在阴暗的货棚下,威尼斯的肉市从1339年起集中了该城的各大肉铺,离旧住宅区里亚托广场只有几步路远,这里的街道、运河都以肉市命名,圣



布列塔尼的法乌埃商场(十六世纪末)。

马托教堂又称“肉户堂”，十九世纪初才遭毁坏。^⑥

“商场”一词因而具有多种含义，从仅能挡风避雨的普通集市直到很早就被称作“巴黎的肚子”的中央菜场的复杂建筑和结构。这个庞然大物的起源可追溯到菲利浦·奥古斯特。^⑦当时在邻近无辜者公墓的尚博兴建了广大的建筑群，但公墓于1786年才开始迁移。^⑧1350至1450年前后的大衰退期间，中央菜场显得相当破落。这场衰退固然是个原因，附近店铺的竞争也是个原因。总之，中央菜场的危机并非巴黎特有的现象，这在王国其他城市相当普遍。一些建筑物被改作他用后摇摇欲坠，有的甚至用于堆放垃

圾。巴黎的纺织品商场，“据 1484 至 1487 年的帐目记载，至少曾部分充当国王炮队的车库”。^④大家知道罗伯托·洛佩斯^⑤关于宗教建筑具有“指示”作用的见解：每当宗教建筑停工，如 1223 年的波洛尼亚大教堂，1265 年的锡耶纳大教堂或 1301 至 1302 年佛罗伦萨的费奥尔圣马丽亚大教堂，肯定就有危机发生。商场的历史从未被人从整体上作过研究，但是能否说商场也具有这个“指示”作用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 1543 至 1572 年间，巴黎的经济复苏应在这个阶段的最初几年，而不是最后几年的事。弗朗斯瓦一世敕令（1543 年 9 月 20 日）于同年 10 月 11 日在高等法院备案，其实不过是第一个信号。其他的信号接踵而来。这些措置的表面目的是美化巴黎，而不是赋予它一个有力的机构。然而，首都的兴旺和发达以及附近的店铺和销售点随着中央菜场的翻修而逐渐减少，都表明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商业行动。总之，中央菜场从十六世纪末起面目一新，恢复了圣路易时代的活力。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复兴”。^⑥

没有一张图样能确切反映中央菜场这一巨大建筑群的完整形象：盖顶的和露天的场所，支撑附近房屋拱廊的立柱，一面制造杂乱，另一面又利用杂乱向四周空地蔓延的商业活动。据萨瓦里^⑦（1761 年）说，这个混合型市场自十六世纪以来不再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过分相信他：市场内部不断出现变迁。十八世纪更有两项革新：小麦商场于 1767 年迁出中央菜场，在斯瓦松府邸旧址重建；十八世纪末，又改建海鲜商场和皮革商场，并将葡萄酒商场迁往圣贝纳尔门。整修乃至拆迁中央菜场的计划曾反复提出，但这庞然大物（占地五万平米）仍合乎情理地留在原地。

中央菜场内，仅呢绒商场、布匹商场、咸货商场（咸鱼）、海鲜商场有房屋掩蔽。但紧挨在这些建筑物的四周，设有种种露天集市，出售小麦、面粉、大块黄油、蜡烛、麻绳和井绳。在沿菜场边缘排列



巴黎中央菜场的女鱼贩正做买卖；图前方有一卖薄饼者。投石党时期的一幅无名氏版画。

的“立柱”附近，因陋就简地住着估衣商、面包师、鞋匠以及“纳付市场税的其他巴黎小商人”。两位荷兰旅行家^⑥说：“1657年3月1日，我们在中央菜场附近逛估衣市。许多出售旧衣服的商贩安顿在立柱支撑的拱廊下……每周有两天逢集：所有估衣商，其中显然包括许多犹太人，在此摆摊售货。过往行人无不讨厌他们的吆喝声：顶呱呱的大鳖！漂亮的短褂！他们详细介绍货物的特色，拉人进铺子看货……他们出售的衣服和家具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货色看来还真不错，但不懂行者贸然购买未免冒险，因为他们有补旧翻新的高超技艺。”这些铺子光线极差，“你以为买了一件黑色衣服，可到了太阳底下，却变成绿色、紫色，或斑点纷呈如豹皮”。

商店鳞次栉比，瓜皮果壳成堆，污水横流，烂鱼遍地，皮加尼奥尔·德·拉福斯^⑦（1742年）承认，很有气派的中央菜场“也是巴黎最脏最臭的地段”。女商贩的人数比男的更多，她们的嗓门也高，享有“全巴黎嘴巴最脏”的美名。“喂！不要脸的！你说！臭婊子！你要勾搭学生，就滚到蒙塔古中学去！你不害臊？老僵尸！欠鞭子抽的！下作坯子！双料贱货，你黄汤灌多了。”十七世纪的女商贩就这样骂个不停。^⑧后来的当然也是如此。

城市必须进行干预

巴黎的中央菜场虽然十分特殊和复杂，它无非表明，一个大城市过早超过通常的规模，就会在供应方面遇到复杂的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自从伦敦以人们所知道的那种方式发展起来后，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英国首都就愈益被众多杂乱的集市所侵占。集市已不能局限在原定地点，逐渐向附近街巷蔓延，使街巷也变成专门的市场：鱼市、蔬菜市、家禽市，等等。在伊丽莎白时代，集市日渐阻塞首都来往行人最多的街道。这种情况直到1666年的大火才得到全面整顿。为了廓清街衢，当局在兴建高大楼房时，四

周留有空旷的院落。这些院落于是成为封闭但是露天的商场,有的专营某些商品,以批发为主,其余的则五花八门。

在所有这些商场中,以里登商场规模最大——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商场——,其景色堪与巴黎中央菜场相比,但是较有秩序。里登商场把1666年设在原址周围的所有集市,即天恩堂街、谷物山、家禽市、鲜鱼街、东便宜坊的集市,统统归并到四座建筑物中去。一百个肉摊在一个院子里出售牛肉,另一个院子里,一百四十个摊位出售其他肉类,别处则出售鲜鱼、奶酪、黄油、钉子、小五金等。所有这些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城市引为骄傲的一大奇观”。里登商场体现的秩序犹如昙花一现。随着城市的继续扩大,种种限制已不再能起作用,原来的困难又重新出现:从1699年起,也许更早,小商再次侵入街巷,在住宅房廊下摆摊,尽管明令禁止,小贩仍在城内到处走街串巷。在这些叫卖的商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顶货筐的女鱼贩。她们名声不佳,遭人耻笑,也受人剥削。如果当天生意兴隆,晚上肯定能在小酒馆里遇到她们。她们像巴黎中央菜场的鱼贩一样粗暴,一样爱惹事生非。^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巴黎。

为了保证市场供应,巴黎只得在首都四周的广大区域组织货源:鱼和牡蛎来自迪耶普、勒克罗图瓦、圣瓦莱里。路过后两个城市的一位旅行者(1728年)说:“我们一路上只遇到赶运海鲜的货车。”他又说,“不离左右跟着我们走的鱼货半路上截不下来,统统运到巴黎去”。^⑪奶酪来自莫城,黄油来自迪耶普附近的古尔奈或伊西尼;供屠宰的牲畜来自普瓦西、苏以及更远的纳布尔的集市;面包以贡内斯的产品为好;干菜的产地在诺曼第的科德贝克,那儿每星期六逢集^⑫……因此必须重新制订和修改一系列措施。首先必须设法保护直接供应城市的地区,通过小本经营的生产者、运输者和销售者的活动,使大城市的市场供应源源不断。因此,大商

人的自由行动被排斥在这个邻近区域之外。夏特莱警察局规定，商人收购小麦，应在距首都方圆十法里之外，收购活牲畜（1635年）应在七法里之外；收购所谓菜牛和猪（1665年）应在二十法里之外；收购淡水鱼应在四法里之外（自十七世纪初开始）^{②3}；大量收购葡萄酒应在二十法里之外。^{②4}

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是马和牲畜的供应。这类嘈杂的集市应尽可能迁往市郊，或至少设在城墙之外。图内尔宫废弃后留下的空地，在辟为伏日广场之前，曾长期充当马市。^{②5}巴黎始终被一圈牲畜交易集市包围着。一个集市刚结束，另一个在第二天又开张，赶集的还是原班人马。“其中一个集市，大概是圣维克多吧，据几位见证人^{②6}说，1667年“集中了三千多匹马，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因为每周有两次集市”。马匹交易其实遍布全城：除了来自外省或外国的“新”马外，还有“业已役使过的老马”，也就是“市民有时想不上集市就脱手”的役马。成群的掮客和马蹄铁匠为马贩子和拥有马厩的商人充当中间人。此外，每个街区还有马匹出租者。^{②7}

大规模的牲畜集市也能吸引大批买卖人，苏（每星期一）、普瓦西（每星期四）以及小巴黎的四门（贵妇门、桥门、贡夫朗门、巴黎门）^{②8}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许多“包买人”（代客垫付货款，随后索回）、中间人、收购人（在法国各地收购牲畜）和肉铺主（并非都是小零售商）的参与下，牲畜交易十分活跃；其中有些人因此发财创业^{②9}。根据一项统计资料，在1707年，巴黎市场上每星期出售的肉类约合1300头牛、8200头绵羊和将近2000头（每年10000头）小牛。同时控制苏和普瓦西牲畜集市的“包买人”于同年抱怨说，“有的买卖在巴黎周围的小蒙特勒依等地成交（脱离他们的控制）”。^{③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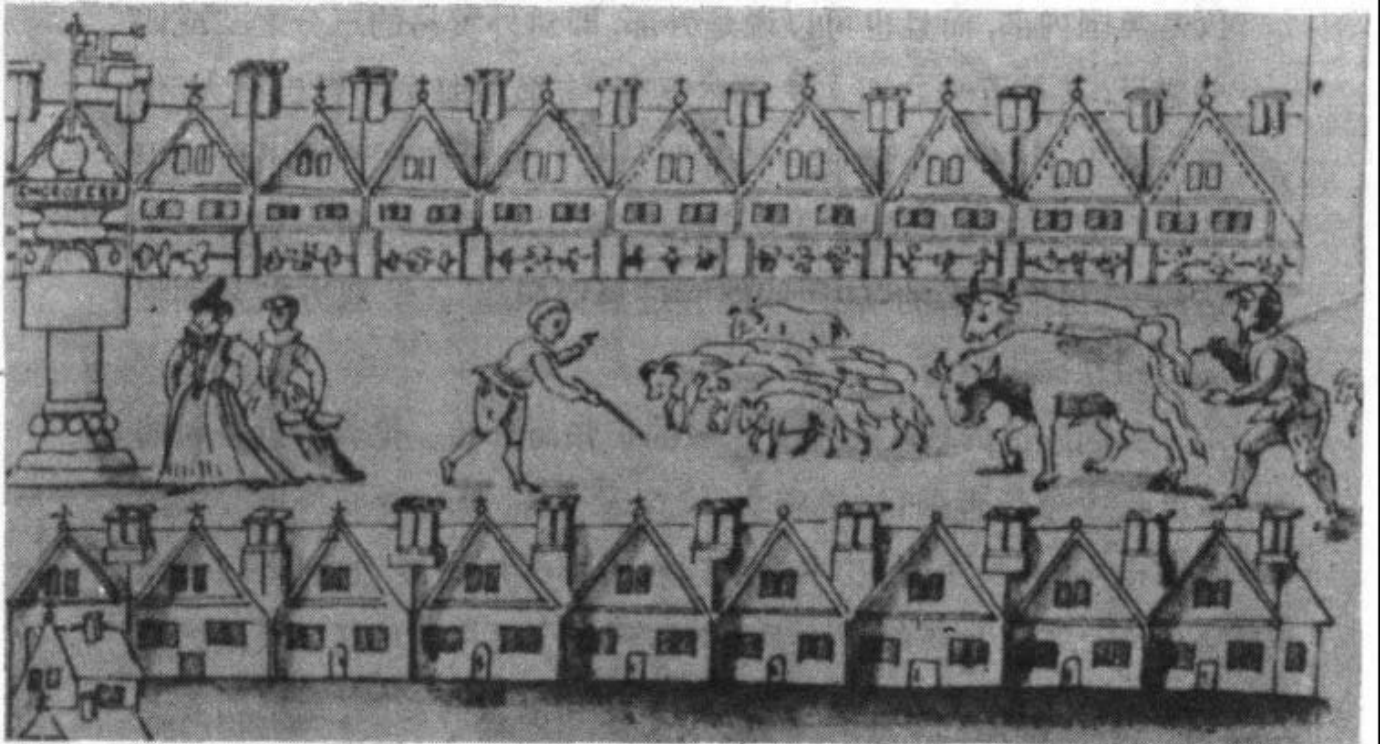
我们切莫忘记，向巴黎供应肉食的集市遍及法国广大地区，这

与首都定期或不定期从各地获取小麦^⑮的情形相同。由此便产生了道路和联络的问题,而这不是用几句话就能概括说明的。关键显然在于利用河道——与塞纳河相连的荣纳河、奥布河、马恩河和瓦兹河以及塞纳河本身。塞纳河穿过巴黎市区的河段两岸散布着兼作集市的码头,1754年达26个之多,那里的货物尤其价廉物美。最重要的有上游货物集散地格雷夫码头,货物是小麦、葡萄酒、木料、草料(草料供应似以杜依勒里码头为主);圣尼古拉码头^⑯接受来自下游的货物。无数船只以及水上马车在河面往返。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另有一些小船供乘客使用^⑰,就像泰晤士河伦敦桥上游的上千艘轻舟一样,可使人免受市内车马颠簸之苦。^⑱

巴黎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有一、二十个其他城市与之类似。任何大城市都有一个与其规模相当的供应区。例如,在十八世纪,为满足马德里的需要,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大部分交通工具被占用,以至打乱该地区的经济。^⑲据蒂尔索·德·莫利纳(1625年)说,在里斯本,一切都极其简单,水果和雪来自塞拉一台斯特雷拉,食物来自大海的好心馈赠:“坐在桌旁就餐的居民眼看在自己家门口……捞起满网鲜鱼。”^⑳1633年7月至8月的一篇游记说,在塔霍河上遥望成百上千的渔船,令人赏心悦目。^㉑贪吃懒做,得过且过,里斯本城靠海吃海。但是这种描写未免过分。里斯本其实单为筹集其日常食用的小麦就十分费劲。何况城市人口愈多,其供应愈得不到保证。威尼斯从十五世纪开始不得不在匈牙利买牛,以保证城市的肉食供应。^㉒伊斯坦布尔于十六世纪人口可能高达70万人,它吞食巴尔干各国的羊群,小麦则从黑海和埃及运来。然而,只要凶暴的苏丹政府稍一松懈,这座大城市的供应就会出毛病,就会出现价格上涨和饥荒,而这类事情在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㉓

伦敦的情形

伦敦的情形相当典型。大体上讲,凡发展过早的大城市可能遇到的问题,伦敦都曾遇到过。由于对伦敦历史的研究比其他城市更完善^①,我们可以不局限于轶事趣闻而得出一些结论。N. S.B. 格拉^②正确地认为,伦敦提供了屠能关于经济区域组织规律的典型例子。伦敦四周经济区的组成甚至比巴黎早一百年。^③几乎整个英国的生产和贸易区域很快全都为伦敦服务。总之,在十六世纪,这一经济区北达苏格兰,南抵英吉利海峡,东接北海(其近海运输对伦敦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西连威尔士和康沃尔郡。但在这个大范围内,有的地区经济不够发达,甚至落后,如布里斯托尔及其附近地区。如同巴黎四周一样(屠能所画的草图),最远的



斯托在《伦敦巡游》中描绘的1598年伦敦东便宜坊是个肉市。肉铺店主住在街道两边,还有一些出售熟肉的烤肉铺。

地区从事牲畜贸易：威尔士从十六世纪起已加入这一行列，苏格兰于1707年同英格兰合并后也不例外。

伦敦的集市中心显然是泰晤士河地区，那里位置近便，水道四通八达，驿站星罗棋布（阿克斯布里奇、布伦特福德、金斯顿、汉普斯特德、沃特福德、圣奥尔本斯、赫特福德、克罗伊登、达特福德），它们全都为着首都忙碌，负责把粮食磨成面粉，加工麦芽，把食品或制成品运往大城市。如果能就这个城市的集市展示前后连续的图片的话，人们将看到，集市跟着城市扩大的速度逐年扩大（1600年至多有25万居民，到1700年则达50万，甚至更多）。英国的总人口也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因此，一位女历史学家的话说得再好也没有了，她认为伦敦“正在吞食英国”。^③詹姆斯一世也承认：“天长日久，英格兰将只剩下伦敦”。^④这些说法显然既恰当又不恰当。既有估计不足，又有估计过高。伦敦吞食的，不仅是英国内部，而且也可以说是外部，即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⑤虽然王室、陆军和海军的胃口很大，伦敦消费不了一切，不能使一切都服从它的资金和高价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伦敦的影响下，国民生产在英国乡村和小城市中发达起来，虽然后者的“转运职能胜过消费职能”。^⑥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提供服务。

英国生活的现代化随着伦敦的扩张而开始。伦敦附近乡村的富庶已令旅行者瞩目，旅店女仆“穿着整齐，颇有贵妇风度”，农民服饰也讲究，吃白面包，不像法国农民那样拖木屐，他们出门甚至骑马^⑦。城市大章鱼的触手已伸展到整个英格兰地区以及遥远的苏格兰和威尔士。^⑧任何地区一旦受到伦敦的影响，无不朝着专业化和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受到改造的部门还很有限，因为在现代化了的地区往往还保留着过去的乡村制度以及传统的庄园和作物。例如，位于泰晤士河南面的肯特郡离伦敦很近，那里经营的

果园和种植的啤酒花都供应首都，但肯特郡仍保留其固有面目；农民、麦地、畜群、茂密的树林（拦路劫掠的盗贼的巢穴），还有大批野物：锦鸡、山鹑、松鸡、鹌鹑、白眉鸭、野鸭……还有石鹇，状似雪鹇，“肉不过一口，但其味鲜美无比”。^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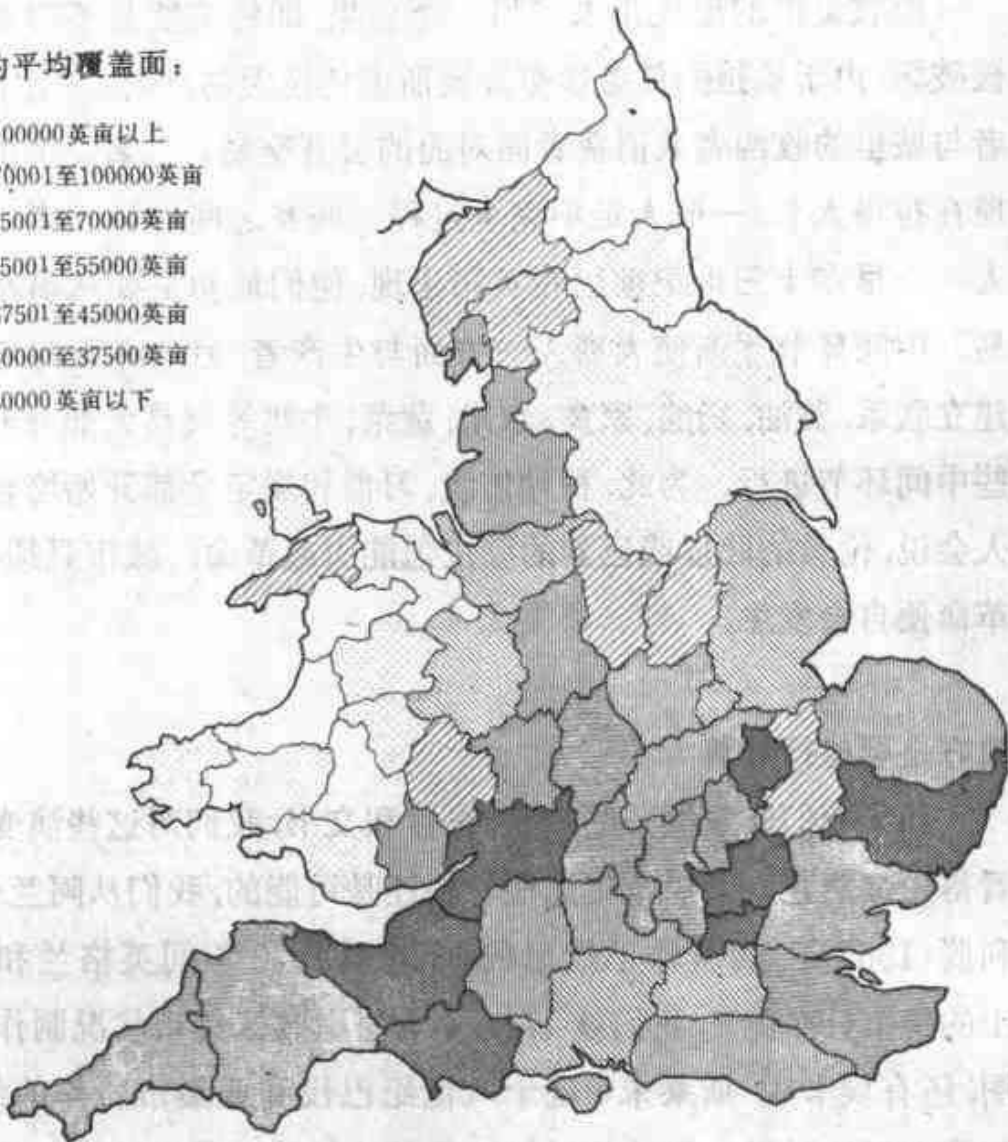
伦敦集市的形成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传统贸易不可避免的被破坏（由于承担的任务很重），而所谓传统贸易，即生产者兼销售者与城里的收购者兼消费者面对面的公开交易。二者之间的距离现在拉得太长，一般人走不完全过程。城乡之间的第三者——商人——早在十三世纪前已在英国出现，他们最初主要从事小麦贸易。中间环节逐渐使大商人一方面与生产者，另一方面与零售商建立联系，黄油、奶酪、家禽、水果、蔬菜、牛奶等贸易大部分通过这些中间环节进行。为此，种种传统、习惯和规定全都开始垮台。有人会说，伦敦的肚皮或巴黎的肚皮怎能引起革命！城市只须壮大，革命便自会发生。

最好是要进行计算

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些数字、帐目和文书，我们对这些演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大量收集这些材料还是可能的，我们从阿兰·埃佛利脱（1967年）的著作里借用的1500至164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集市分布图^⑩，我们就1722年卡昂财政区集市状况制作的地图，还有埃卡脱·斯莱末^⑪就十八世纪巴伐利亚集市所作的统计，都是有用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以及其他材料只是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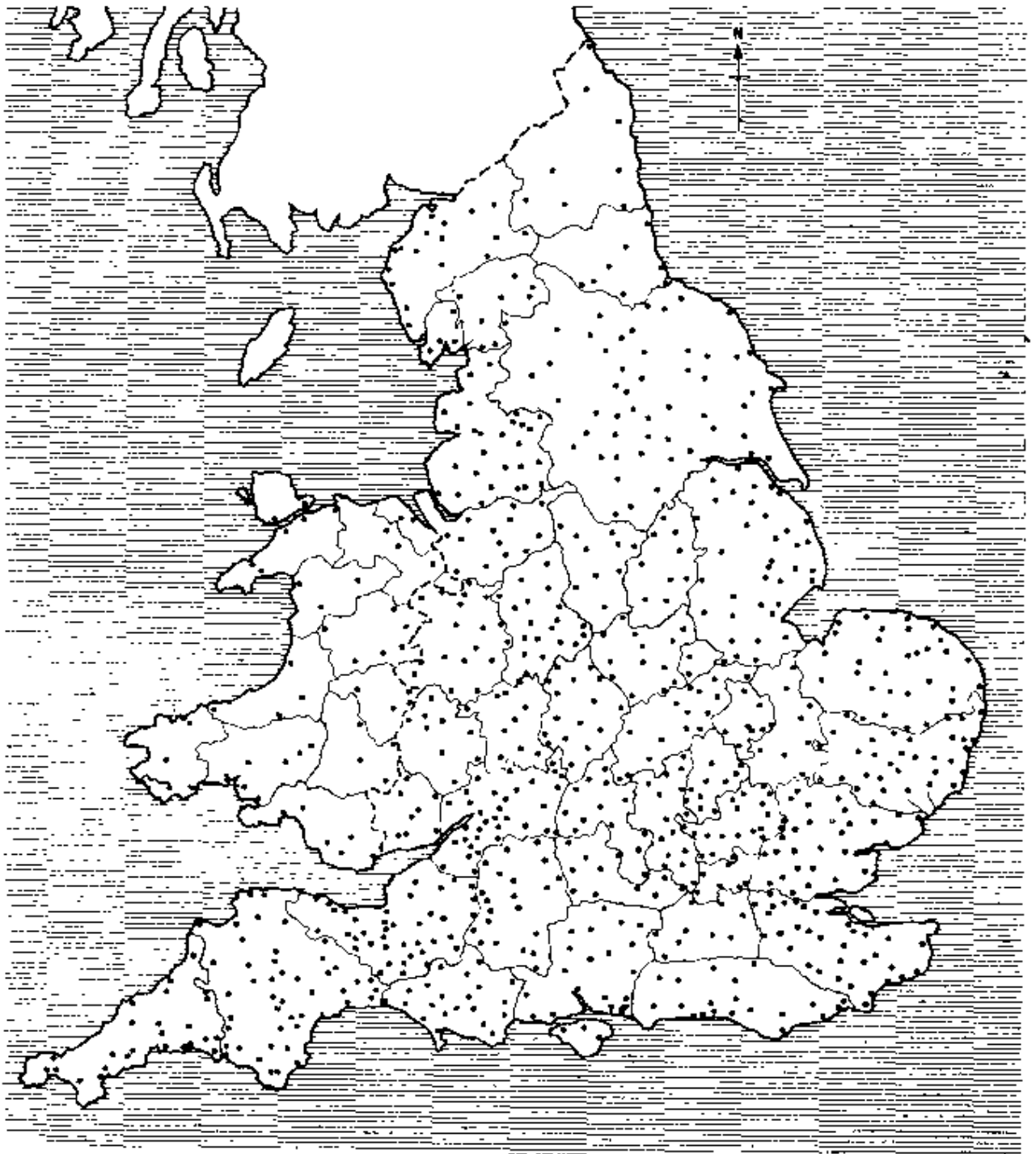
除五、六个村庄保留自己的集市外，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约有760个设有一至几个集市的城镇，威尔士约有50个此类城镇，合计约800个经常举行集市的城镇。两个地区的人口约在550万上下，每个设集城镇的交易活动平均涉及6000至7000人，虽然

集市的平均覆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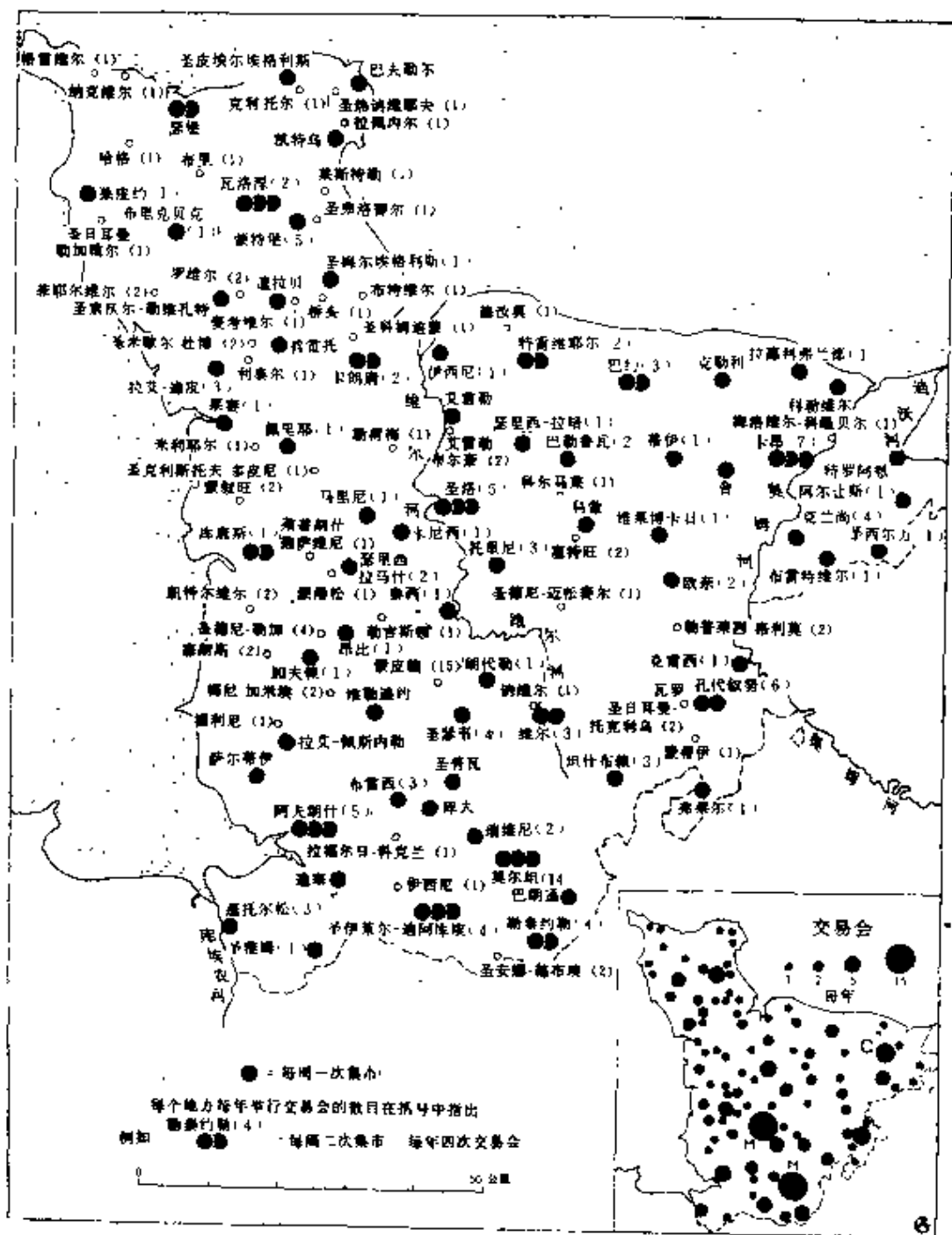
2. 1500 至 1680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设集城镇的密度

按郡计算每一设集城镇平均覆盖的区域面积，阿兰·埃佛利脱得到的数字从北端和西端的四万多公顷到最低的一万二千公顷。人口愈多的地区，市场的覆盖面愈小。见阿兰·埃佛利脱，《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1967 年版，第 497 页，《设集城镇》图。



3. 1500 至 1640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八百个设集城镇

每个城镇至少有一个集市,通常包括几个。除集市外,还应加上交易会。同见上书第 468—473 页。



4. 1725 年卡昂财政区的集市和交易会

该图系 G. 阿尔贝洛根据卡尔瓦多斯州档案馆档案绘制。J.C.佩罗又给我指出该图未标出的 6 个交易日(圣让-迪瓦尔 1 个, 贝里 2 个, 莫尔坦 1 个, 瓦西 2 个), 共计 197 个交易日, 会期多数仅 1 天, 间或有 2 至 3 天, 卡昂大交易会长达 15 天。每年逢会日共 223 天。此外, 每周有 85 个集市, 即每年共 4 420 个集市日。财政区当时人口约在 60 至 62 万之间, 面积约 11 524 平方公里。如有类似的统计资料, 就能对法国各地进行有益的比较研究。

其本身居民平均在1 000人左右。可见城镇商业活动涉及的人数大致等于其人口的六至七倍。在十八世纪末年的巴伐利亚,我们找到相近的比例:一个集市平均涉及7 300人。^④我们不应从这一巧合引出某种规律。比例肯定视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而异。何况还必须注意每一种计算是怎样进行的。

大家知道,十三世纪英格兰的集市可能比伊丽莎白时代多一些,虽然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几乎相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或系伊丽莎白时代每个集市的活动范围更广,或系中世纪英格兰集市数量过多,领主们为了面子或利益竭力开设集市。总之,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些集市已经“消失”^⑤,历史学界近来起劲地谈论“消失的村庄”,这样做固然有道理,但是“消失的集市”同样值得重视。

随着十六世纪的经济高涨,尤其在1570年后,新的集市纷纷出现,也有的是旧集市从沉睡中苏醒或者死灰复燃。由此引起的争执不计其数。人们搬出了旧契约,证明谁有权收取市场杂税,由谁负担市场设施的开支:灯、钟、十字架、秤、店铺、供出租的地窖或货棚,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根据供货的性质、距离以及运输的难易,根据生产和消费的地理状况,集市之间开始实行分工。埃佛利脱列出的八百来个城镇集市平均涉及方圆7英里(11公里)的范围。1600年前后,小麦陆路运输路程不超过10英里,甚至低于5英里;牛的运输距离可达11英里;绵羊40至70英里;羊毛和毛织物为20至40英里。唐克斯特是约克郡最大的羊毛市场之一,在查理一世时代,顾客来自盖恩斯伯勒(21英里)、林肯(40英里)、沃索普(25英里)、普莱斯利(26英里)和布兰克尼(50英里)。林肯郡凯尔拜地方的约翰·哈切尔把他的绵羊卖往斯坦福、牛卖往纽瓦克,又去斯皮尔斯比、波士顿和伯恩分别购买小牛、鱼和葡萄酒,至于奢侈品,则往伦敦采购。这种分散情形说明集市的专业化

程度在提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800 个城镇中,至少有 300 个城镇的活动是单一的: 133 个城镇从事小麦贸易; 26 个蔬菜集市; 6 个水果集市; 92 个牛市; 32 个羊市; 13 个马市; 14 个猪市; 30 个鱼市; 21 个家禽和野味市; 12 个黄油和奶酪市; 30 多个城镇经营羊毛或毛线买卖; 27 个城镇出售呢绒; 11 个出售革制品; 8 个出售亚麻,至少有 4 个推销黄麻。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更细的专业姑且不计在内,例如怀门德姆仅限于出售木匙和木旋塞。



农妇前来市场出售活家禽。大不列颠博物馆一份 1598 年手稿的插图。

集市的专业化当然在十八世纪日趋加剧,而且不仅在英格兰。因此,如果我们有可能用统计数字标出欧洲其他地区的各个阶段,我们将得到一张欧洲发展图,这张图将比我们现有的纯叙述性材料有用得多。

然而,这也正是埃佛利脱著作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随着英

格兰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定期集市的组织形式显然已不再适应,尽管集市交易更趋集中和更加专一,尽管还有交易会补充集市的不足。关于交易会这另一种传统工具,我们后面再谈^⑩。交换的高涨有助于采用更加自由、更加直接的新流通渠道。我们已经看到,伦敦的扩张对此有所促进。阿兰·埃佛利脱所说的“私下交易”开始盛行了。采用“私下交易”这种说法,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其实无非是绕开受严密监视的公开交易的一种方法而已。从事这种私下交易的人往往是流动的大商人,乃至小贩或经纪人:他们为预购小麦、大麦、绵羊、羊毛、家禽、兔皮和羊皮,不惮进入村民的厨房,也就是说把买卖从集市移到村庄中去成交。这些新来的客商往往在旅店安营扎寨,旅店因此取代集市,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们风尘仆仆,从一城市赶到另一城市,从一郡赶到另一郡,这里与一店铺主挂钩,那里又与一商贩或批发商联系。他们有时也扮演大批发商的角色或充当种种形式的中间人,不但能向尼德兰的啤酒酿造业主提供大麦,而且能在波罗的海收购黑麦,以满足布里斯托尔的需要。他们间或二、三人合伙经营,分担风险。

这个以多种面目出现的新人因其狡猾、无情和冷酷而遭人厌恶和仇恨,有许多诉讼案可作佐证。这种新交换方式以一纸文书预约购货(出售者往往不识字),导致种种误会乃至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但对紧催驮马赶路或在岸边监督装载粮船的商人来说,他那辛苦的旅行生涯也自有其迷人的魅力:从苏格兰到康沃尔郡横穿英格兰,在沿途旅店中巧遇朋友或同行,自信买卖做得聪明而大胆,除了以上这一切,还能赚大钱。这场革命已超出经济范围,而涉及社会行为。埃佛利脱认为,这些崭新活动的发展与独立派的政治团体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内战结束后,大小道路于1647年左右开始畅通,康沃尔郡一位名叫胡格·彼得的布道士感

叹说：“多么可喜的变化！人们重新畅行无阻地从爱丁堡来到康沃尔郡的每个角落，不必到了家门口还被挡回去；大路重又活跃起来，听到车夫吹着口哨驱车前进，看到信使每周在固定路线上奔走，山岗为之欣喜，河谷为之欢笑！”^⑩

英国如此，欧洲亦然

私下交易并非在英格兰所仅见。在大陆上，商人似乎也对出门远行感兴趣。巴塞尔人安德雷奥·里夫是位勤奋谨慎的商人，他在十六世纪后五十年内不断在外奔忙，平均每年旅行三十次，他谈到自己时说：“我很少休息，几乎双腿不离马鞍”。^⑪限于现有资料，我们确实不容易把忙于赶交易会的流动客商同希望直接在产地购货的商人区分开来。但可以肯定，在欧洲各地，公开交易几乎到处都显得不敷需要和受到太多的监视，无论我们观察哪个地区，都能看到有人采用或将要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径。

德拉马尔在其论著的一个注释中指出 1693 年 4 月巴黎行商的舞弊行为，“他们不在中央菜场或公开市场出售货物，而是在旅店内外成交”^⑫。此外，他还历举磨坊主、面包商、肉商以及囤积居奇者为低价采购、不惜损害集市正常供应所采用的种种手段^⑬。1385 年左右，在诺曼第的埃夫勒，公共秩序保护人揭发生产者和商贩相互串通，“咬耳朵、打手势和讲切口”。另一种违反法规的做法，是小商贩赶在农民“来到中央菜场”之前，截下他们的物品^⑭。同样，在十六世纪的卡庞特拉，蔬菜商用低价拦路买下运往集市的货物。^⑮这在所有城市都是常见的事。^⑯尽管如此，直到十八世纪，即在 1764 年 4 月，这在伦敦还被当作舞弊而遭到检举。一份外交函件说，政府“至少应关心食品昂贵在百姓中造成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引起这些怨言的流弊可归罪于执政者，因为物价昂贵的主要原因是麇集在首都的垄断商贪得无厌。他们近来在途中截住

农民, 夺下各种食物, 再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在集市上转手倒卖……”^⑩我们的见证人还说, 这是一种“无赖行径”。不过, 这种行径到处都存在。



蔬菜商和驴子。“新鲜的甜菜, 水灵的菠菜”。

十六世纪的木刻。

真正的走私也到处滋生, 法规、关卡和税务部门对走私毫无办法, 即使追查也白费力气。所有货物都可走私: 印花布、盐、烟草、葡萄酒和烧酒。在法朗什—孔代地区的多尔(1728年7月1日), “走私商品公开交易……因为有一名商人为索取这类货物的价款而敢于打官司”。^⑪德马雷(路易十四晚年最后一任财政总监)的一名下属向他报告说:“阁下即使在布列塔尼和诺曼第沿海一带布置军队, 也阻止不了走私活动。”^⑫

形形色色的市场: 劳动力市场

多种形式的交换, 无论是直接交易或间接交易, 不断使各地经

济出现动荡,即使在最平稳的地区也不得安宁。交换造成经济动荡,有人甚至会说:交换促使经济活跃。无论如何,一切都要被投入市场,不仅是农产品和工业品,而且是地产,还有流通速度比任何商品都快的金钱,还有人的劳动,且不说人本身。^①

当然,无论在乡村或市镇,历来存在着房地产买卖以及住宅、店铺或空房租赁之类的事。我们这里不想拿着文件确认十三世纪热那亚有房屋出售,在同时期的佛罗伦萨,一般是先租得土地,然后建造房屋。^②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这些交易正成倍增加,房地产市场开始形成,并最终暴露出投机盛行。投机盛行意味着交易数量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巴黎十六世纪后房租的变化(包括店铺的租金)可证明这一点:租金确定无误地随着商情和物价起伏波动^③。一个简单的小例子便足以为证:切塞纳位于农业富饶的埃米利亚地区,该地市立图书馆碰巧保存的一张店铺租契(1622年10月17日)是事先印就的:只要填满空白,然后签字就够了。^④投机活动具有近代的特征,但其“倡导者”及其主顾并不始于今日。就巴黎而言,早在十六世纪,我们已能追踪当时针对塞纳河附近长期荒废的教士草场的投机活动^⑤;图内尔宫原址的地皮也同样空着,以哈尔雷院长为首的财团于1594年起建筑大批华丽的住宅,这些位于今天伏日广场的住宅将出租给大贵族家庭。^⑥十七世纪,这类投机在圣日尔曼关厢一带以及其他地方发展很快^⑦。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在位期间,首都布满了建筑工地,不动产更加走俏。到1781年8月,一位威尼斯人写信回国说,巴黎罗亚尔宫最美的人行道遭到破坏,树木被砍伐,“所有市民对此啧有烦言”,沙特尔公爵打算“在那儿建造房屋,然后出租……”^⑧

地产方面也发生相同的演变:“土地”终于进入了市场。在布列塔尼以及其他地区,从十三世纪末^⑨或更早的时候起,领地能够出售和倒卖。我们拥有关于欧洲土地价格^⑩及其定期上涨的一系

列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例如，在1558年的西班牙，据一位威尼斯大使^⑳说：“惯常定其收益为价值的8%或10%（就是说以土地收益的十二倍半或十倍）而出让的产业（土地），如今定其收益为价值的4%或5%（就是说以土地收益的二十五倍或二十倍）：“随着钱财的充裕”，土地的价格翻了一番。到了十八世纪，布列塔尼领地的地租由圣马洛大商人代为征收，这些中间人网络的中心设在巴黎，称作“包税人公所”。^㉑各种新闻出版物都乐于刊登地产出售启事。^㉒广告业在这一领域并不落后。总之，不论有无广告，在整个欧洲，土地正通过买卖不断改变主人。这一运动显然到处都与经济和社会的演变相联系，原来拥有土地的领主和农民在这一演变中失去土地，获益的则是城市的新富人。早在十三世纪，法兰西岛地区的“无地领主”（马克·布洛赫语）或居·富尔干所说的“仅剩零头的领地”大批激增。^㉓

短期的和长期的信贷市场是欧洲经济发达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信贷市场并非到处都以相同的速度或效率发展起来。但是，借贷关系和高利贷网的建立却是普遍现象，无论是犹太人、伦巴第人或卡奥尔人操纵其事，或像在巴伐利亚那样，由修道院专门向农民放债。^㉔每当我们找到一些资料，总能看到高利贷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个文明地区无不如此。

反之，信贷市场只能存在于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十三世纪，它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初露头角。当时具备各种有利条件：资本积累，远程贸易，汇票的使用，早就发明的公债券，对手工业和工业活动或对造船业和航运业的投资。早在十五世纪前，航运的规模变得过大，船只不再是个人的财产。巨大的金融市场接着迁往荷兰，后来又移到伦敦。

根据本书的观点，在这么多的市场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市

场。同马克思一样,我把奴隶制的情形暂且搁在一边,虽然这个制度注定还要延续下去和重新抬头。^⑳我们认为,问题在于观察人或至少人的劳动怎样变成商品。一位像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这样有头脑的思想家曾经指出,“每个个人的体力(我们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在市场竞争中可供正常交换的一种东西^㉑,虽然这种概念在当时还不十分通行。我比较喜欢一位无名之辈的感慨,这位法国驻热那亚领事的思想显然落后于时代,他说:“大人,我头一次听说人可以用货币论价。”李嘉图后来笼统地说:“劳动,如同一切可以买卖的东西一样……”^㉒

毫无疑问,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不是工业时代的新创造,姑且说这一概念来自工业时代。假定人原来曾拥有生产资料:土地、织机、马匹、驮车,一旦他被剥夺了这些传统的生产资料来到市场时……他可供出卖的只剩他的双手、胳膊和“劳动力”,当然还有他的能力。以这种方式出租或出售自身的人,穿过市场的小孔,脱离传统的经济。中欧矿工的情况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长期是分小组劳动的独立工匠,于十五和十六世纪被迫接受商人的控制,因为唯有商人才能拿出巨款购买开采深层矿脉所需的器材。这些工匠于是成了雇佣劳动者。约阿希姆斯塔尔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小型矿业城市,当地行政官员于1549年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一方出钱,另一方做工”。难道还有更好的说法能表明劳资间初期的对立^㉓吗?雇佣制确立后虽然可能被取消,如匈牙利葡萄种植业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杜凯于1570年间,大包尼恩于1575年,圣乔治盆地于1601年,分别恢复了农奴制。^㉔但这是东欧的特殊情形。在西欧,向雇佣制的过渡往往开始较早,尤其是其实例也比人们所说的更多,这种现象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在十三世纪,巴黎的格雷夫广场及其附近朝圣保罗·台尚方向的朱累广场和圣热尔万教堂后方“靠近看守所”的广场,都是约定

的雇工市场^⑮。1288至1290年间伦巴第皮亚琴察附近的一家砖厂的劳动契约得以保存至今。^⑯1253至1379年间,葡萄牙农村使用雇佣劳动者,这也有文书为证。^⑰在1393年勃艮第的欧塞尔^⑱,葡萄种植工人举行罢工(我们须记得,在当时的城市里有一半人以农业为生,葡萄又是工业的原料)。我们从中得知,在大忙季节里,雇主和雇工每天清晨在城市的一个广场上会面,雇主往往由包工头作代表。这是我们凭确凿证据找到的最早劳动市场之一。在1480年的汉堡,零工前往“安慰桥”寻找雇主,那儿已是“一个公开的劳动市场”。^⑲在塔尔芒·德雷奥时代,“荐身为仆者伫立阿维尼翁桥头”。^⑳其他市场同样存在,例如交易会上的“零工市”(“从圣约翰节、圣米歇尔节、圣马丁节、诸圣瞻礼节、圣诞节、复活节开始”^㉑,男女仆役任雇主(大农庄主或如古伯维尔爵士一类的领主)^㉒挑选,像牲畜一样被人评头品足。“1560年前后,下诺曼第的每个乡镇都有零工市,起着奴隶市场和传统集市的作用。”^㉓埃夫勒圣约翰节(6月24日)的驴市同时是雇佣仆役的场合。^㉔每逢收获季节,许多零工从各地拥来,按照习惯,以劳力换取现金或实物报酬。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大规模的人口运动;统计数字^㉕不时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还可以通过精确的微观观测,例如就安茹的一个小城市贡捷堡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情形^㉖,看到大批零工前来从事“砍伐、锯劈木材;修剪和采摘葡萄;松土除草,培植蔬菜;收割饲草并入仓;割麦、捆把、脱粒和清理”。据巴黎的一份资料^㉗记载,仅仅在干草码头,就有“起岸工、挂钩工、套圈工、装车工、捆草工等零工”。我们对这类工种的名称颇费思索,因为在每个词背后,都必须想象出过去城市或乡村社会中的一种相当持久的雇佣劳动。当时的多数居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可以设想,劳动市场多数也在农村。随着近代国家的发展,出现了另一巨大就业途径:充当雇佣兵。在这方面,买卖双方都按市场规律行事,在

一定场所成交。同样,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等级的仆役,巴黎于十四世纪已有不同的荐头店或职业介绍所,纽伦堡在1421年肯定已有了这类劳动市场。^⑧

劳动市场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正规化,其规则也变得更加明白。阿勃拉姆·杜·普拉台尔(尼古拉·德·勃雷尼的化名)编写的《1692年巴黎地址便览》给巴黎人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⑨;若要雇女仆,请去箴筐街找荐头店,您应去新市场雇男仆,去格雷夫广场找厨师。假如想找帮工,商人就去坎岗普瓦街,外科医生去科特里埃街,药剂师去拉于歇特街;在格雷夫广场可雇到利穆赞的泥水匠和小工,但“鞋匠、锁匠、细木匠、制桶工匠、造枪工匠、烧烤师傅和其他小工都上店铺登门自荐”。

总的来说,雇佣劳动的历史并不十分清楚,但从一些抽样调查看来,雇佣劳动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都铎王朝时的英格兰,“一半以上乃至三分之二的家庭至少有部分收入来自工资”。^⑩到十七世纪初,在汉萨城邦,特别在施特拉尔松德,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断上升,发展到约占居民的一半以上。^⑪大革命前夕的巴黎,数字竟超过50%。^⑫

早已开始的这一进化过程当然远远没有结束。杜尔哥偶而曾有抱怨,他说:“只有货币流通,却没有劳动流通。”^⑬其实,流通已经开始,并且将孕育未来的所有变化、适应机制和痛苦。

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且不说其原因如何,也不论它在经济上有何益处,毋庸置疑地总是伴随着社会风气的某种败坏。十八世纪众多的罢工^⑭以及工人明显的焦躁不安就足以为证。让-雅克·卢梭谈到工人时说:“谁若得罪他们,他们立即捆好铺盖走人。”^⑮这种敏感,这种觉悟难道果真是同大工业的前提一起诞生的吗?当然不是。在意大利,粉画工匠历来是亲自劳动并雇有帮工的手工业者,帮工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像商人一样开店记

帐, 我们还有罗伦佐·洛托、巴萨诺、法利纳蒂和圭尔金的帐本。^⑳ 唯独铺主才是商人, 他与顾客打交道, 接受活计。帮工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佣工, 他们动辄闹事, 包括铺主的孩子在内。因此就不难理解粉刷工贝尔纳蒂诺·莫蒂雅对他的客户奇皮翁·切博所说的话: 两位很有地位的画师阿历克桑得罗·阿齐利和巴尔都维尼都想雇他们干活, 他拒绝了, 宁愿保全自己的自由, 不肯“为微不足道的工资”而丢开自己的营生。^㉑这件事情发生在 1590 年!

市场是一条可以移动的界线

市场实际上是条像分水岭那样的界线。根据你处在这条界线的一侧或另一侧, 你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除墨西哥的丝织工人^㉒外, 还有成千种其他行业的工匠, 注定只能从集市取得供应。他们迁入城市后依赖集市的供应(其依赖程度远远胜过贵族或资产者, 这两种人往往在市郊拥有一块土地, 一个菜园或果园, 因而有自己的食物来源)。如果这些工匠对用海路运来的劣质小麦制作的价格既高、且有霉味的面包厌烦了, 他们至多前往卡塔尼亚和米拉佐(他们于 1704 年左右决定这样做)去另找工作和换个食品市场。

对于那些通常不去或少去集市的人来说, 逛市场简直就像过节, 像是出门旅行, 甚至像去冒险。正如西班牙人所说, 这是“出风头”的一次机会。十五世纪中叶的一本商业教程^㉓说, 海员一般都很粗俗; 他们的“头脑是那么迟钝, 每当在小酒馆喝上一杯酒或在集市买点面包, 就自以为了不起”; 同样, 这位西班牙士兵^㉔利用战斗间隙来到萨拉戈萨的集市(1645 年), 面对成堆的新鲜金枪鱼, 鳟鱼以及上百种海鱼和河鱼, 竟惊讶不已。他口袋里有的是铸币, 但结果又买了什么呢? 只是几条腌制的沙丁鱼, 他请街头小酒馆的老板娘煎熟, 当作下酒菜, 这就算是他的盛宴了。



Вид на площадь от Троицкого дворца, 1920-е гг. В центре — здание
Троицкого дворца, в правой части — здание Троицкого дворца.



安特卫普的市场。十六世纪末无名氏画作。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



在十八世纪的匈牙利，抬猪前往德布勒森中学。

农民的生活当然还停留在市场之外(至少有一半在市场之外)，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农民一生中满足于消费用自己的双手生产的产品或用食品和劳务向邻居换来的产品。他们去城镇集市的人虽然很多，但在集市只买他们不可缺少的铁犁头，而把出卖鸡蛋、黄油、家禽或蔬菜所得的钱留着纳税，他们不能算真正投入市场交换，而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例如这些诺曼第农民，他们“带着十五至二十苏的食品去赶集，不能上酒馆把这点钱统统花光”。^⑩一个村庄与城市的交往，往往靠城市里某位商人或当地农庄主充当中间人。^⑪

任何人都不否认，并且经常有人指出，农村中存在着这种局处一隅的生活。但毕竟还有程度的不同，还有例外。许多富裕农民充分利用市场：英国农庄主每年冬天不必从事毛麻纺织，而能把

他们的收获化为商品,他们同时向市场采购和供货。联合省的农民生产牛奶、肉、油、奶酪和经济作物,购买小麦和烧柴,他们的村庄很大(居民有时达三、四千人),虽然布局有疏密的不同。匈牙利的农民向德国和意大利出售他们喂养的家畜,并购买他们缺少的小麦。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的市郊菜农已被纳入大城市的生活,并依靠大城市致富:巴黎附近的蒙特勒依因其桃园而使路易一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1783年)神往不已^⑤。在伦敦、波尔多或昂古莱姆周围,谁能知道有多少兴旺的农产品集散地^⑥!在世界范围内,以上情形显然属于例外,农民约占世界人口80%至90%。但不应忘记,即使贫困的乡村也受到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的传染。铸币还通过市场以外的不同渠道来到乡村。流动商贩,村镇高利贷者(我们想到意大利北部乡村的犹太人)^⑦,乡村实业家,资产者以及为开发其土地而寻找劳动力的农庄主,甚至村庄中的店铺主,他们都促进市场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古代经济史学家看来,狭义的市场仍是一种检验标志,不能低估它的价值。比斯特拉、切维科娃借此制定一种比例尺,根据对市场征收销售税的多少衡量保加利亚多瑙河沿岸各城市的经济实力,同时指出,税款用银币支付,已有专业市场的存在^⑧,这些都是正确的。关于摩尔达维亚雅西市的两三条注释指出,该市在十七世纪已有“七个商品市场,其中有的就以其主要商品命名,如靴市、面粉市等……”^⑨这表明了商业活动中有一定的分工。阿瑟·杨格走得更远。他于1788年从阿拉斯出走时,遇到“一百多头驴,负载看来很轻,以及几群男女”,这就足以保证市场供应充足。但“一大部分乡村劳动力在收获季节也因赶集而不劳动,如果在英格兰,为同样大小的城市提供给养的人要少四十倍。”他最后说:“既然有那么多人集在集市游手好闲,我敢保证土地所有权一定极其分散”。^⑩照那么说,集市上闲逛与玩乐的人少难道就

是现代经济的特征？

在市场的下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并日益侵占邻近的低级活动区域，市场的规模变得更大，界线开始移动，基本活动也发生变化。金钱在农村很少成为真正的资本，它被用于购买土地，从而企求提高社会地位；此外，它更多地是被积攒起来，我们想到中欧妇女的铸币项圈，匈牙利乡村的金银器皿^⑭，大革命前法国农妇的金十字架。^⑮金钱对旧的价值和平衡起着破坏作用。受雇佣的农民习惯于用货币算帐，虽然帐目由雇主在记，实物预支又很多，以致到了年底几乎没有现金可拿到手。^⑯但时间长了，心理状态也就发生变化。劳动关系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容易适应现代社会，但总是对穷人不利。

一位名叫埃米利奥诺·费尔南台兹·德·皮内杜的青年人专攻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史^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说明，乡村的人口和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的重大影响。巴斯克地区于十八世纪确实趋向于形成一个“民族市场”，地产因此日益商品化；教会的土地以及原则上同样不可触动的长子世袭土地，最后都进入了市场。于是，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原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变得更穷，被迫越来越多地通过狭小的缺口流向城乡的劳动市场。劳动市场的壮大导致了后果不可逆转的动荡。这一演变基本上重复了早先英格兰大庄园的诞生过程。

市场就是这样配合着历史的发展。初级集市是经济阶梯的一级，虽然是最低的一级。每当市场不存在或几乎不起作用时，每当现金因数量过少而价值猛增时，我们对人类活动的观察肯定停留在零平面，也就是说，每个人被迫生产几乎是自己生活所需的一切。欧洲前工业时期的许多农业社会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处于

市场经济之外。去那里旅行的人花几个银币就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所有的产品。其实,要碰上这类奇遇,不一定非得像曼里克大师^②那样于1630年左右前往若开邦,花4里亚尔换30只鸡,或用2里亚尔换100个鸡蛋。只要离开大路,进入山间小道,来到撒丁岛,或在伊斯特里亚海岸的偏僻港口停留就够了。总之,十分活跃、随处可见的市场活动往往挡住历史学家的目光,使他看不到下层平凡但又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经济,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文化。米歇尔·莫里诺^③或马尔科·卡蒂尼^④的尝试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试图揭示处在市场下面、不受市场控制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地位。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思路完全相同:粮食市场一方面是依附于该市场的居民区,另一方面又是可按已知标准事先计算出来的居民消费需求。如果我另外还了解当时的粮食产量、价格、市场出售数量、居民消费数量和进出口数量,我就能想象出市场下面发生的或应该发生的事。米歇尔·莫里诺为进行这项研究,选定了夏尔维尔这个中等城市,马尔科·卡蒂尼则从莫德尼斯地区一个比较偏僻,因而更接近乡村生活的小市镇出发。

伊夫—玛丽·贝尔赛^⑤最近发表的关于十七世纪阿基坦穷汉起义的论文是以不同手段进行的类似探索。借助这些起义,他再现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向,这恰巧是历史学家往往忽略的事。我特别欣赏他对乡村小酒铺中狂暴酒徒的描写,这些酒铺的气氛总是一触即发。

总之,道路已经打通,方法和手段可能千变万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们可以肯定,假如不能系统地探测市场之下的人群的生活,就谈不上完整的历史,更谈不上名符其实的乡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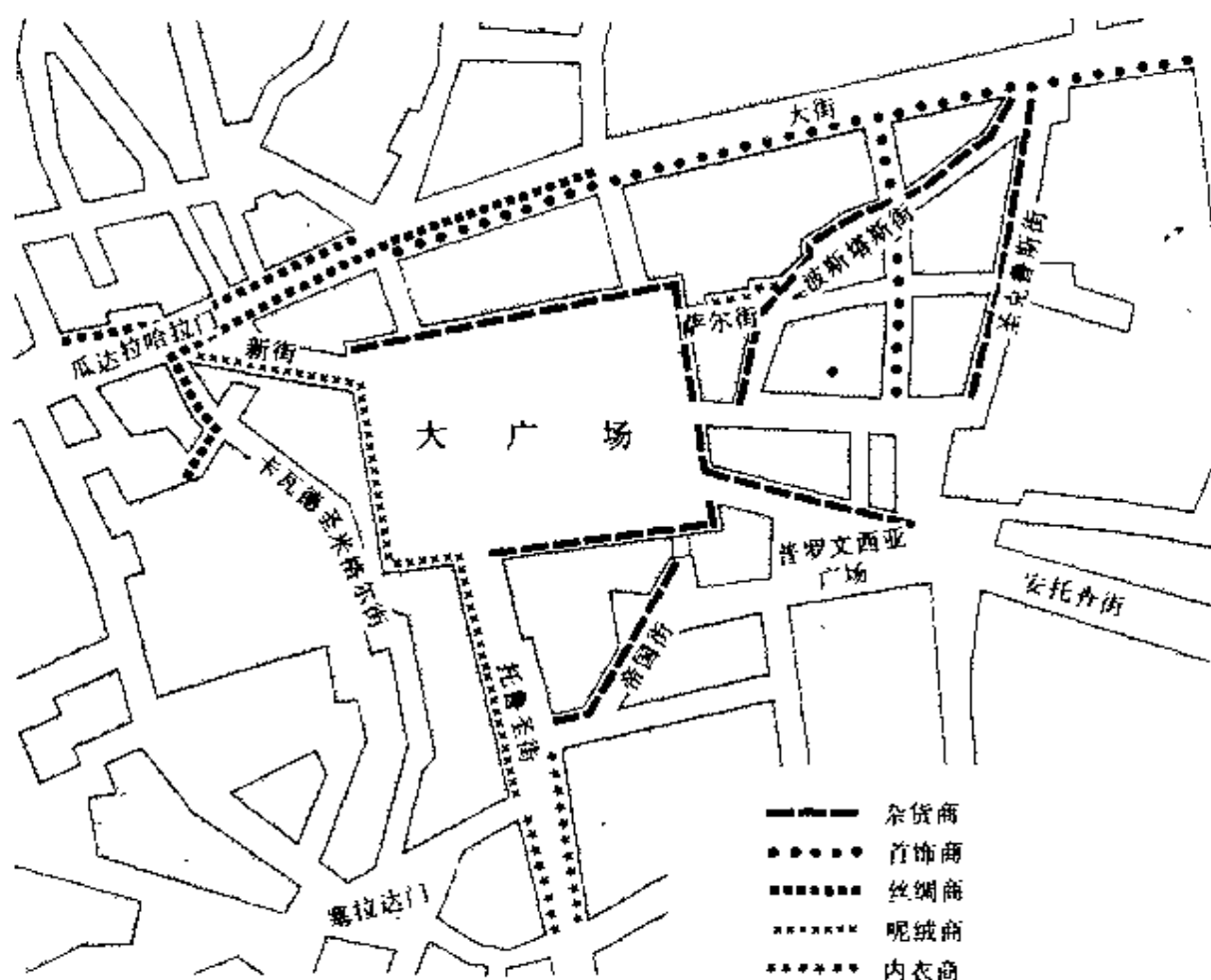
店铺

集市最早遇到来自店铺的竞争(交换因此得益)。数量众多、规模有限的店铺是交换的另一基本工具。二者既相同,又有不同,因为集市的开放时断时续,而店铺却几乎从不停止营业。这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因为说到规律,总伴随着许多例外。

为此,人们往往用 *marché*(集市、市场)一词翻译穆斯林城市所特有的“苏克”,其实,“苏克”通常是条街道,沿街店铺属于同一个行业,这种现象在西方各城市也很常见。早在十二世纪,巴黎圣艾蒂安·杜蒙教堂附近的肉铺使圣热纳维埃夫山街改称为肉铺街。^⑩1656年的巴黎,“在圣婴堂的堆尸所旁边……开有各种五金铺”。^⑪1643年的里昂,“家禽在圣约翰街鸡市的专门店铺中出售”。^⑫有的街道聚集奢侈品商店(见下面的马德里地图)。据一位旅行者(1680年)说,里亚托桥头圣马克广场的服饰用品市使人对威尼斯叹为观止。^⑬据德·勃洛斯院长的记载,在马赛旧港的北岸,许多店铺出售来自勒旺地区的商品,“这些店铺的生意是那么兴隆,一块20尺见方的地皮竟以150里佛出租”。^⑭这些街道也是专业性市场。

另一个例外:欧洲以外曾出现两种新奇现象。据旅行家说,中国人于十七世纪大力开发扬子江上游的四川,那里与人口集中的内地不同,居民点极其分散;但尽管分散,却出现了一些小店铺的群落,起着固定集市的作用。^⑮又据旅行家说,十七世纪的锡兰岛亦复如此:没有集市,只有商店。^⑯再者,如果回到欧洲,巴黎街头搭起的临时摊棚,1776年的敕令对这类建筑禁而不止,又该给它们什么名称?这些摊棚的流动性与集市相像,但它们每天营业,这又与店铺相同。^⑰我们的怀疑是否到顶了?不,因为在英格兰,像韦斯特勒姆这样的商业集镇在有集市以前早就出现了成排

的杂货店和衣料店。⑭何况许多店铺就设在集市所在地；逢集之日，店铺继续营业。这与在里尔商场占一席之地，以便在鲜鱼市楼下卖咸鱼的情形完全相同。集市和店铺不是很难分开⑮吗？



5. 马德里及其奢侈品商店

马德里自 1560 年被选为西班牙首都后，在十七世纪已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商店成倍增加。在大广场四周，奢侈品商店分别按行业集中。见 M. 科倍拉和 A. 马蒂拉·塔斯孔：《马德里的五大行业》，1957 年版。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店铺显然不同于集市，而且二者的区分逐年变得更加清楚。

在十一世纪，当城市在西方各地诞生或复兴时，当集市重新复活时，市镇的扩展使城乡区分变得更加明显。城市中集中了新兴的工业以及大批手工工匠。当时出现的第一批店铺其实就是面包

师傅、屠户、鞋匠、铁匠、成衣工以及其他小手工业者的作坊。这类工匠最初不得不离开店铺，到集市或商场去出售产品，他的工作使他同店铺保持“蜗牛与外壳”的关系。^⑮市镇当局为保护消费者而强迫工匠这样做，因为集市便于监视，而在店铺里，每人都能自己作主。^⑯但工匠很快就在自己的店铺营业，即在集市歇业的日子，在“自家门口”售货。由于这种交错活动，最早的店铺同集市有点相像，也是一个断续的售货地点。在葡萄牙的埃武拉，1380年前后，屠户在自己的店铺里卖肉，而每周三次集市，他只去一次^⑰。1643年间，一位斯特拉斯堡人看到格勒诺布尔的屠户在家里割肉卖肉，而不去商场，“像其他商人一样在店铺里”^⑱出售，感到十分惊奇。巴黎的面包师傅在其店铺中出售普通面包和高级面包，而把粗面包于每星期三、六送往集市。^⑲1718年5月，国王的敕令又一次造成货币混乱（建立约翰·劳体系）；于是，据一位为我们充当见证的托斯卡纳大使说，“面包师傅或者因为害怕，或者出于狡猾，不再按惯常的数量送面包上市；^⑳每到中午时分，公共广场上就见不到面包；更糟糕的是，逢集那天，他们把每磅面包的价格抬高二至四苏。在这方面，当地没有别处那种良好的秩序”。

可见最早开设店铺的是手工工匠。真正充当交换中间人的“坐商”后来才出现；他们周旋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仅从事买卖，而从不亲手（至少不是全部）制造他们提供的商品。从一开始，他们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商业资本家，从金钱A出发，取得商品M，然后按照AMA的公式定期重新取得金钱，“资本家放弃货币，仅仅是为了取回货币。”农民则相反，他来市场出售物品，往往是为了立即购买他需要的东西；他沿着MAM的路线，从商品出发，又回到商品。工匠也一样，他要向市场购买食物，没有存钱的条件。当然也可能有些例外。

这位独树一帜的中间人不久即将兴旺发达，他的前途已经预



阿姆斯特丹面包铺和呢绒店相邻。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画家雅各布斯·佛雷尔的画作。

先注定。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一前途，而远不是中间人的起源；起源问题很难搞清楚，虽然中间人的发展过程显得比较简单：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依然存在的行商从十一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起，突然遇到了城市的兴起；其中有些人便开始定居和加入城市行会。就特定的地区而言，这一现象不能用某个确切日期来规定。比如说，对德国和法国来讲，这一现象肯定是从十三世纪开始，但不一定就发生在十三世纪。^⑳早在路易十三时代，就有一些“灰脚板”告别浪迹生涯，开一家小铺定居，与工匠为邻；他的店铺与工匠的店铺看来相似，其实不同，而且这一差别与日俱增。十八世纪的面包铺与十五世纪或更早以前的铺子没有什么不同，而在十五和十八世纪之间，商业店铺及其经营方法转眼就发生变化。

商人在城市落户的同时，加入了行会，他们一开始并不与行会相分离。他们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这对他们像是一个污点。直到1702年左右，法国的一份报告说：“商人在工匠中确实可被认为高人一等和占据首位，但仅此而已”^㉑。但这是法国的事。法国商人即使变成了“批发商”，他的社会地位问题也并不就此得到解决。商人代表在1788年还在抱怨说，直到那个时候，批发商仍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㉒阿姆斯特丹、伦敦甚至意大利就没有这类怨言。^㉓

最初，往往直到十九世纪以后，商店出售各种商品，不论它们是来自第一手、第二手或第三手的商品。这些店铺最早通常被称作杂货店，这很说明问题。杂货店(mercier)一词来自拉丁文的merx, mercis, 即一般商品。俗话说：“杂货商什么都卖，但什么也不生产。”每当我们对杂货店的存货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商品，无论在十五世纪的巴黎^㉔，在普瓦蒂埃^㉕，在克拉科夫^㉖或在曼恩河畔的法兰克福^㉗，或在亚伯拉罕·登特的店铺，此人于十八世纪在英格兰北部威斯特摩兰郡的小城市柯比斯蒂芬



6. 柯比斯蒂芬的杂货商亚伯拉罕·登特的供货人。

见 T.S.维伦:《柯比斯蒂芬的亚伯拉罕·登特》,1970 年版。

开店。②

这家杂货店里什么货物都卖,我们根据该店保存下来的文件可了解它 1756 至 1776 年间的经营情况。首先出售各种等级的茶

叶(红茶或绿茶),价格较高,因为柯比斯蒂芬位于内地,从走私得不到好处;其次还出售精糖、粗糖、面粉、葡萄酒和白兰地、啤酒、苹果酒、大麦、啤酒花、肥皂、西班牙石膏、炭黑、灰粉、蜂蜡、油脂、蜡烛、烟草、柠檬、干杏仁与葡萄干、小豆、胡椒、常用香料、桂皮、八角……在亚伯拉罕·登特的店里,还有丝织品和棉毛织品以及种种缝纫用品。甚至书刊、历本和纸张也应有尽有。总之,店里不卖的东西很少,主要是盐(原因不明),还有鸡蛋、黄油和奶酪,大概因为这类货物在集市上供应充足。

顾客自然主要是小城市及附近村庄的居民。货物来源(见下图)②分散于相当广阔的区域。柯比斯蒂芬没有水路可通,陆路运输虽然贵些,却有班期可循,承运人在运来货物的同时,接受亚伯拉罕·登特用于付款的期票和汇票。信贷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不仅商店的顾客可以赊帐,店主对他的供货人也如法炮制。

亚伯拉罕·登特并不满足于店铺本身的营业。他还收购织袜,并在柯比斯蒂芬一带推广加工业务。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工业家,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一般经伦敦批发商的介绍卖给英国军队。由于批发商在结算时允许他们在他们那里取得汇票,亚伯拉罕·登特也就变成了汇票商人;他掌握的票据实际上大大超过其营业额。使用汇票就是开展信贷。

从 T.S.维伦的书看来,似乎亚伯拉罕·登特是个非凡人物,几乎所有事物都要插上一手。这也许是真的。1958年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个小城市,我曾遇到过一个坐商,同他极其相像:在他开的铺子里,可以买到或订购你所要的一切,甚至领取银行支票。杂货铺不就是要满足地方的各种需要吗?能否做到这一点,就看铺主的本事了。我们这里有十五世纪中叶的一位慕尼黑杂货商的帐本③,他似乎也是位非凡人物。他光顾各个集市和交易会,前往纽伦堡、诺德林根采购,有时甚至远行威尼斯。但从他的住房来



站在柜台后边的苏格兰女杂货店主(1790年前后),她出售的商品有糖块、绿茶、衣料、柠檬和蜡烛等。她戴的金耳环和煤玉项圈表明她的生活相当富裕。

看,仅一间屋子,家具少得可怜,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

商店的专业化和等级化在发展

除了无所不包的杂货店以外,经济发展还制造了商店的其他专门形式。人们逐渐把商店分成几种:按斤两出售的食品店;按尺寸出售的绸布店;按件数出售的五金店;专买旧衣服旧家具的估衣店。最后一种占着重要地位,1716年里尔一地就有一千多

家。^{②6}

由于各种“服务项目”的兴起,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商店,如药店、当铺、钱庄、银行和旅店,旅店往往代客介绍车马运输,还有小酒店,“这些酒商在自己家里摆上桌椅,招徕客人前来吃喝”^{②7},酒店在十八世纪遍布各地,引起正派人的种种非议。有些小酒店确实名声不佳,如巴黎“熊街”的那一家,那里“不像规矩人的住所,更像个贼窝”^{②8},虽然邻近的烧烤店传来的味道很香。在前面这张单子上还应加上“代笔人”以及公证人。据1643年一位路过里昂的旅行者说,他在街上看到代笔人和公证人像鞋匠一样坐在自己的铺子里等待主顾”。^{②9}但从十七世纪开始,有的公证人地位已经很高。而有的“代笔人”却穷得开不起铺子,只能在巴黎圣婴堂的廊檐下摆摊,好歹赚上几个子儿,幸亏不识字的男女仆人和穷人数量很多^{③0}。另外还有妓院,如西班牙的“窑子”。蒂尔索·德·莫利纳在《比拉都尔》^{③1}中说,在塞尔维亚的蛇街,“可以见到亚当像真正的葡萄牙人一样寻花问柳……即便嫖一次只花一个杜加,钱袋也转瞬就被掏空”。

商店终究要分门别类。商人与商人也不全都一样。金钱很快强制划分等级;它几乎从一开始就给杂货店分出档次:最上面是几个专门从事远方贸易的富商,最下面是只卖针线、油布的小店主,即谚语正确而无情地嘲弄的那种“一篮提杂货店”,他们穷得连女仆也不肯下嫁,特别是稍有积蓄的女仆。一般情况下,总有一批商人力图爬到其他商人的头上。在佛罗伦萨,大行业与小行业相分离。在巴黎,从1625年法令到1776年8月10日敕令,最体面的行业有六个,其排列次序是:呢绒业、食品业、钱庄业、首饰业、杂货业、皮货业。在马德里,高踞首位的五大行业在十八世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伦敦有十二个大行业。在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区分更加明显:大商人实际上已成为贵族,他们掌握着

治理大商埠的权力。

商店征服世界

在我们看来,根本问题在于各种类型的商店正在征服所有的城市,并很快要吞噬乡村;因陋就简的杂货铺、小客栈和小酒馆于十七世纪,尤其于十八世纪,在乡村立足。小酒馆兼营小额借贷,又是“集体娱乐的组织者”,这种状况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法国乡村还可见到。人们到村子的小酒店去“赌钱、谈话、喝酒和消遣……处理债务和商务,谈交易和订租契……”这几乎是穷人的集会场所!小酒店在村庄里是教堂之外的另一个中心。^⑬

成千上万份见证表明商店的蓬勃发展。在十七世纪,店铺简直泛滥成灾。洛佩·德·维加于1606年谈到刚成为首都的马德里时说:“一切都已被改造成为店铺”。^⑭店铺而且变成流浪汉小说中骗子无赖的理想活动场所。巴伐利亚的商人“数量与面包师傅相等”。^⑮1673年,法国大使“为建新楼”需要拆毁在伦敦的寓所,一时竟找不到住房,他写道,“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自从我到达以后,许多高大房屋被拆掉,改建成商店和商人的小屋,出租的屋子很少”,而且价格奇昂。^⑯据丹尼尔·笛福说,店铺数量猛增,简直“骇人听闻”^⑰:1663年这座大城市总共不过五、六十家杂货铺;到了十七世纪末,已达三、四百家:商店大事修饰,争相安装镜子、金色廊柱以及青铜的挂灯和壁灯,以至笛福认为过分豪华了。但一位法国旅行家(1728年)对这些早期的橱窗赞叹不已,他写道:“在我国一般罕见的,是此间用华美明亮的玻璃装饰店铺,商品通常就陈列在玻璃后面,既防灰尘,又便于行人从各个角度看到其漂亮的外表。”^⑱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扩展和富人的迁居,商店逐渐向西发展。佩特·诺斯特路长期是伦敦的商业中心,突然一天之内,店铺全都搬到考文特花园街;此后不到十

年,时髦又转往路德门高地:后来,商店又朝着朗考特,芬丘奇街或郝兹狄契方向集中。但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类似的经历。商店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货摊逐渐侵占街道,或者从一个街区迁往另一个街区。^②请看咖啡馆怎样在巴黎普及^③:在高内依的时代^④,充满商业嘈杂声的罗亚尔宫长廊曾是巴黎的一大奇景,如今已被塞纳河两岸的咖啡馆所替代,特别是“小敦刻尔克”的五光十色使伏尔泰^⑤眼花缭乱。小城镇也经历类似的变革。在十八世纪初的马耳



十八世纪下半叶马德里的奢侈品店铺:古玩店。其装修可与笛福描绘的十八世纪初伦敦新商店相媲美。路易斯·帕累和阿尔卡萨尔作画,马德里拉札洛博物馆。

他,据一份详细的报告^②说,“杂货铺和零售商数量增加之多,以至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有生活保证。他们只得欺诈顾客,要不就会迅速破产。由于生意清淡,许多青年人为了这一足不出户的懒汉行当,葬送了从妻子那儿得来的嫁妆或从父母那儿得到的遗产,这种情形委实惨不忍睹。”报告又气愤地说,马耳他的各家商号中金银物件成倍增加,使资本“陷于无用和死亡”,小户人家的男女老少居然也以呢绒花边装饰。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妓女竟身穿丝绸,坐着马车招摇过市。报告直截了当地说,既然禁娼已有明文规定,至少应对她们“征收一笔穿衣税”。从相对意义上讲,难道这不是说,消费社会已经诞生了吗?

事情毕竟是循序渐进的:1815年,当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别离二十年后重返伦敦时(他于1796年第一次去伦敦),他感到眼花缭乱:一些古怪的店铺廉价抛售商品,江湖骗子遍地皆是,还有固定的或活动的招贴,“可供行人随时浏览”。前胸和后背都挂着广告牌的“三明治人”在伦敦刚刚出现^③。

兴旺的原因

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作结论,可以说,供应部门猛烈扩张,交换加快(集市和交易会都可作证),第三产业(店铺的营业,服务业的发展)兴旺发达,而这最后一项与整个经济发展不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计算人口数和店铺数之间的关系^④,或手工作坊和商店各自的比例,或一个店铺的平均规模和平均收入,这一兴旺可以用许多数字来表示。威纳尔·桑巴特^⑤特地引证了尤斯图斯·默泽尔的话:这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于1774年在谈到奥斯纳布台克城时,有点伤感地说,“近百年来,杂货店的数量增加了二倍,手工工匠却减少了一半”。另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汉斯·毛埃斯贝尔^⑥,他在发表类似看法时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德国大城市的一系列数据。我们

不妨随便找几份调查材料(死亡者财产清单),其中一份涉及菲力浦四世时代的马德里^⑤,另外二份关于十七世纪的加塔洛尼亚和热那亚的零售商在西西里岛情形^⑥,人们看到这些小本经营的店铺岌岌可危,清帐时往往留下一大堆债务,破产更是家常便饭。人们有这样的印象——虽然仅是一个印象——如果当时的小商人心直口快,那么“布热德运动”恐怕在十八世纪早已形成。在伦敦,当福克斯内阁于1788年试图向小店主征税时,他面对“人民的普遍不满”^⑦,很快后退了。小店主显然不等于人民,但他们在人民中有煽动力。1793和1794年巴黎的无套裤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小店主。^⑧由此可以相信一份初看起来有点偏颇的报告,该报告声称,1790年左右的巴黎有二万名零售商处于破产的边缘。^⑨

以上表过不谈,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

——长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的高涨,零售商希望安顿下来的心理,这些因素决定了供应环节的膨胀。中间人过多,这至多证明,经济活动的高涨超过了经济本身的增长,前者对后者期望过高;

——销售网点的固定,店铺营业时间的延长,广告的出现,讨价还价以至随意闲谈对店铺的生意大概都有好处。走进店铺,既可购物,又可聊天。这里像是小型戏院。请看《彬彬有礼的市民》一书的作者于1631年所想象的那种风趣而逼真的对话。^⑩亚当·斯密难得一次诙谐地把会说话的人同不会说话的兽类作了比较:“交换东西的意向大概是交谈的可能后果”。^⑪普通百姓喜欢闲聊,即使买卖不一定成交,拉上几句话总也是好的;

——商店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处在零售店之上的批发商实行赊帐,零售商必须开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期票。佛罗伦萨的大商人吉齐亚迪尼·科西^⑫有时兼营西西里小麦进口(他们曾借钱给伽里略,这个大家族至今引以为荣),向食品零售商销售胡椒,

Guenee
28 juin 1770

Acte de liquidation des biens de M. de la Roche
M. de la Roche a exposé toute sa situation
patrimoniaire et a exposé que les biens de son épouse
et de ses enfants sont en liquidation
et de ses enfants

| | | | |
|----------------|-------------|---|---|
| M. de la Roche | 1200 | " | " |
| M. de la Roche | 200 | " | " |
| M. de la Roche | 2500 | " | " |
| M. de la Roche | 8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60 | " | " |
| M. de la Roche | 500 | " | " |
| M. de la Roche | 20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0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100 | " | " |
| M. de la Roche | 4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6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150 | " | " |
| M. de la Roche | 150 | " | " |
| M. de la Roche | 1100 | " | " |
| M. de la Roche | 800 | " | " |
| M. de la Roche | 900 | " | " |
| M. de la Roche | 600 | " | " |
| M. de la Roche | 800 | " | " |
| M. de la Roche | 400 | " | " |
| M. de la Roche | 250 | " | " |
| M. de la Roche | 6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20 | " | " |
| M. de la Roche | 1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800 | " | " |
| M. de la Roche | 3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600 | " | " |
| M. de la Roche | 1600 | " | " |
| M. de la Roche | 240 | " | " |
| | <u>2752</u> | " | " |

巴黎的一家面包铺破产——1770年6月28日

巴黎的面包铺主人盖斯内先生谨向巴黎商事裁判所递交资产负债概况，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列出的债务有顺逆之分，我们今天则称之为破产人的资产和负债。文件共四页，这里翻印的第一页清楚地表明有一系列赊销。有的大债务人竟是高等法院顾问。外欠债务皆因赊购面粉。这家店主除铺子外还拥有一些“工具”，一辆车和一匹送货的马，估价共6600里佛，其余动产约值7400里佛。读者请放心，面包铺主已同其债权人订立了协议。但愿他的主顾能及时付清欠帐。（塞纳省档案馆，D⁴B⁶，II，案卷526）

付款期限长达十八个月,这有帐本可以作证。何况这也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店铺也对顾客赊销,尤其对富裕的顾客,裁缝实行赊帐;面包铺实行赊帐(每天在两块相连的木板上刻道道^②,铺主和顾客各执一块);小酒店实行赊帐^③;酒客用粉笔把欠帐记在墙上;肉铺也赊帐,笛福说:我认识一家人,他们每年收入达几千镑,每次给肉铺、面包铺和奶酪铺付款以一百镑计,经常积欠一百镑。^④《地址便览》(1692年)^⑤上登录了在中央菜场开估衣店的符尔纳拉先生,他自称能“提供体面成衣,每人每年收四个皮斯托尔”,我们可以打赌说,这位供应成衣的商人并不始终要求事先收费。此外,巴黎圣玛丽区新街这三位合伙的估衣商“出租各种丧服,包括大衣、黑纱、翻领,甚至丧礼时穿的黑礼服”^⑥,也未必当场收钱。



药铺: 奥斯塔河谷的依索涅古堡的壁画,十五世纪末。
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商人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求得生

存。他的地位很不稳定,随时可能栽跟头。供货人(指与批发商相联系的中间人或批发商本人)一旦向他逼债,他就大难临头了。碰到一位富裕顾客赖帐,女鱼商简直就走投无路(1623年),她说,“我刚开始能挣钱糊口,现在突然只剩下白板”^⑧,这里说的“白板”是指面值十德尼埃的小角币,等于说落到只剩最后一个角币的地步。所有店铺上都可能遇到拖欠或赖帐这类倒霉事情。一位名叫弗朗斯瓦·波姆罗尔的制枪工匠闲来喜欢做诗,他于1632年抱怨生计艰难:“出门讨帐,煞费苦心/赶上拖欠,得有耐心”。^⑨

我们只要有机会读到小商人、中间人、供货人的信札,就会看到这种抱怨极其普遍。1669年5月28日:“我们再次写信给您,想知道您究竟何时愿意付款”。1669年6月30日:“先生,我很惊讶,我一封接一封地给您写信,竟得不到任何回音。正派人至少应该懂得给人复信吧……”1669年12月1日:“我们从没有想到,您在答应来舍下结帐以后,竟然不打招呼就溜了”。1669年7月28日:“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您写信为好,我给您写的信已不计其数,看来您对我的信毫不在意。”1669年8月18日:“我请您付款,迄今已过六月”。1676年4月11日:“我看您的来信只为逗乐”。所有这些信件出自里昂不同商人的手笔。^⑩有一位债权人气急败坏地在信中通知赖帐的债户,他将亲自前往考勒诺布尔,采用强硬手段讨帐。在路易十四时代,兰斯一名商人轻易不肯借钱,他引用一句谚语为证。“借钱时称兄道弟,还债时骂婊子养的。”^⑪

由于信贷法规很不完备,便产生连锁性的依附关系和困难。1728年10月,在第戎圣奥斯迪交易会,布料销售很旺,丝毛织品则不然。“据说原因在于,零售商抱怨他们本小利微,遇到顾客不能付款,他们也就不能重新进货。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零售商无力付款,前来交易会的批发商拒绝再次赊帐。”^⑫

我们不妨把以上的形象同笛福的解释作个比较。笛福指出,

信贷环节是贸易的基础, 债务相互抵销, 商业活动和商业收益因此倍增。档案材料有个缺点, 它不能展示交易的正常发展, 仅为历史学家收集破产、诉讼和灾难这类事例。同幸运的人一样, 一帆风顺的交易没有引人注意的特殊事故。

商贩的繁忙活动

商贩也是商人, 通常比较贫苦, 脖子上挂个货筐或者干脆背驮少量商品。他们却是从事贸易的一支可观的机动力量。他们填补城乡供应网的空白, 尤其在乡镇。由于空白很多, 他们便滋生繁殖, 成为时代的标志。他们在各地的名称众多(法国称 colporteur, contreporteur, porte-balle, mercelot, camelotier, brocanteur; 英国称 hawker, hucktser, petty chapman, pedlar, packman; 德意志的每个地区又有不同的名称: Höcke, Hueker, Grempler, Hausierer, Ausrufer, Pfscher, Bönhasen; 意大利叫 merciajuolo, 西班牙叫 buhonero)。在东欧, 小贩的名称也各不相同: 土耳其语的 seyyar satıcı 同时具有商贩和铺主的含义, 保加利亚语的 sergidzyja(从土耳其文 sergi 演化而来), 塞尔维亚和克罗提亚语的 torbar(从土耳其语 torba 演化而来), torbar i srebar 以及 Kramar 或 Krämer(该词显然来自德语, 兼指小贩、商旅领队或小市民)^①, 如此等等。

产生这么多名称的原因在于, 商贩远非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类型, 而是包括难以合理分类的一系列职业。在 1703 年的斯特拉斯堡^②, 萨瓦磨刀匠是一名“贩卖”其劳务的工匠, 他像许多通烟囱的、修椅子的工匠一样到处流浪; 马拉加台利亚脚夫^③是坎塔布里亚山区的农民, 他在旧卡斯蒂利亚高原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之间往返贩运小麦、木料、木桶板料、咸鱼和粗呢; 用一个形象来表达, 他们是流动商贩^④, 因为他们一身兼任采购、销售和运输三

职。克拉科夫附近安德雷胡夫村半耕半织的农民无疑是商贩,至少那些前往华沙、格但斯克、利沃夫、塔诺波尔,或去卢布林和杜布诺的交易会,甚至到过伊斯坦布尔、士麦那、维也纳和马赛推销本村生产布料的农民是商贩。这些不惜离乡背井的农民有时“率先在德涅斯特河和黑海航行”(1782年)。^⑳曼彻斯特的富商或约克郡和考文垂的制造商亲自为客户送货,足迹遍布整个英格兰,又该称他们是什么?笛福^㉑说:“如果不计其财富,他们就是商贩。”商贩一词也适用于所谓赶交易会的商人^㉒(即来自外地的商人),无论在法国或在别国,他们中有的相当富裕。

不管是穷是富,商贩维护、促进和推广交换。事实证明,但凡商贩占首位的地方,经济一般比较落后。波兰的经济落后于西欧,商贩在波兰自然最为兴旺。贩卖难道是过去几百年里正常贸易方式的残余?下罗马帝国的“希利人”(Syri,操希腊语的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㉓以贩卖为生。中世纪风尘仆仆、行踪不定的西方商人,是活脱的小贩形象。1622年有一篇杂文^㉔描写这种商贩,说他们“肩背挎包,穿着鞋尖包皮的鞋子”;他们的妻子随后紧跟,头戴“一顶后檐下垂齐腰的大帽子”。不过这对四处漂泊的夫妻总有一天要开铺子安顿下来,改变装饰,显得不那么穷困潦倒。在从事贩卖的商人中,至少那些拥有车辆的,难道就没有殷实富户?只要碰上机会,他们的地位就会上升。我们曾谈到过的乡村小店,几乎都是商贩于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向商业堡垒发起攻击:慕尼黑十八世纪有五十家意大利或萨瓦商行都是商贩发家后创办的^㉕。在十一和十二世纪,当时欧洲城市的规模与村庄相差无几,可能也曾产生过类似的现象。

总之,商贩的活动如果加在一起,影响就很大。平民文学和历书几乎完全由他们负责推广。^㉖波希米亚十八世纪生产的玻璃^㉗,无论在奥斯曼帝国或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英格兰或在俄

罗斯；完全由商贩销售。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瑞典，一半以上的国土空无一人；稀少的居民点分散在广袤的原野。但是韦斯特洛戈蒂或斯莫兰的小商贩，依靠他们坚忍不拔的韧劲，居然能在那里同时贩卖“马蹄铁、钉子、锁、别针……历本、宗教图书”。^{②③}犹太客商占波兰贸易额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②④}，他们在德意志地区也取得成功，并在盛极一时的莱比锡交易会上居重要地位。^{②⑤}

贩卖并不始终甘居末位，它曾多次试图扩大地盘，侵占集市。1710年9月^{②⑥}，巴黎商事院拒绝了莫伊斯·德·瓦拉布里奇和伊斯莱尔·德·雅齐尔的要求：这两位阿维尼翁的犹太人希望“在一年四季中有六个星期能在王国的所有城市销售丝绸呢绒织品和其他商品，而不必开设铺子”。他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小贩，他们的申请被认为“有损于贸易以及王国百姓的利益”，是对当地店铺和商人的一种不加掩饰的威胁。相反，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大商人和大店铺主，乃至不起眼的店主，在背后操纵小贩的行动，把堆在店里碍事的“存货”交给他们销售。小贩的本领在子：起售数量小，深入交通不便的地区，说动犹豫不决的顾客。他们像巴黎大马路上兜售劣质商品的贩子一样，不辞劳苦和肯费唇舌。他们机灵、圆滑、逗趣，在舞台上就以这种形象出现：如果说1637年上演的那个剧本里^{②⑦}的寡妇最后没有下嫁给花言巧语的小贩，她并非没有动心：

此人倒也聪明乖巧，
我若有意他也有情，
但他整年到处卖报，
收益不够买副眼镜。

不论合法与否，小贩四处闯荡，甚至来到威尼斯的圣马克拱廊和巴黎的新桥。阿博桥（芬兰）被店铺占据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小贩们在桥的两头聚集^{②⑧}。波洛尼亚大教堂对面的广场上，每星期

二、六逢集，为防止小贩把广场变成常川集市，不得不制订专门的规定。④科隆街头叫卖的小贩有三十六种之多。⑤1643年的里昂城，叫卖声此起彼伏：“小贩无货不售：煎饼、水果、木柴、木炭、葡萄干、芹菜、煮豆、柑桔等等。生菜和青菜用小车推着叫卖。苹果和梨煮熟后出售。樱桃则过秤论磅计价。”⑥巴黎、伦敦、罗马的市声进入了文学作品和风俗画。大家知道，卡拉齐或朱泽培·巴伯里所画的罗马街头小贩销售无花果和甜瓜、香菜、柑桔、松饼、饼



莫斯科街头卖发面煎饼的商贩。1794年版画。

干、葱头、面包、旧衣服、成捆的布匹和口袋装的煤块、野味、田鸡……人们能否想象，十八世纪优美的威尼斯城竟然充斥叫卖玉米饼的商贩？1767年7月，玉米饼确实在威尼斯到处大量出售，“每个只值一苏”。据一位观察家说，这是因为“城内饥饿的平民越来越穷”⑦。又有什么办法能摆脱这群流动商贩呢？任何城市对此

都一筹莫展。吉·巴丹于1666年10月19日^⑤谈到巴黎时说：“此间开始对妨碍公共交通的各种摊贩进行整顿，希望使巴黎街道从此变得十分整洁；国王说，他要把巴黎改造成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这些努力当然犹如驱赶成群的苍蝇，徒劳无功。不辞辛劳的商贩足迹遍布城乡所有道路。晚到1778年，甚至荷兰还有成群的行商走贩，他们“把无数外国货物卖给每年在乡村别墅过一段时间的富人”。^⑥这种生活方式很晚才成为人们疯狂追求的目标，但在当时的联合省，富人对此已相当热衷，商贩蜂拥而来与此可能不无关系。

行商走贩往往与人口的季节迁移相结合：例如萨瓦人^⑦和多菲内人定期前往法国和德国；奥弗涅山区^⑧，特别是圣弗卢尔高地的居民，有去西班牙走串的习惯。一些意大利人来法国“过季”，有的满足于在那不勒斯王国转上一圈；也有法国人步行到德国去的。从马格朗^⑨（今天的上萨瓦省）的商贩来往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流动“手饰匠”（其实是钟表商）在1788至1834年间的往返情况，这些父子相传的工匠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把他们的商品送到南德意志的店铺出售或去参加瑞士的交易会（卢塞恩和楚尔察赫）^⑩。运气有好有坏：1819年5月13日，在卢塞恩交易会，收入“勉强只够晚上喝半公升酒”。^⑪

有时会出现小商贩突然入侵的现象，这与危机年代人们外出谋生有关。1783年的西班牙^⑫曾采取全面措施，禁止一切流动商贩入境，特别是“驯兽表演者”以及“脖子上挂着大十字架、自称能用祈祷为人畜治病”的江湖庸医。这里所说的流动商贩，习惯上指马耳他人、热那亚人和本地人，但不指法国人，这大概完全出于疏忽。这些有业游民与无业游民在途中邂逅相遇，自然会拉上关系，前者有时也参与后者的坑蒙拐骗活动。^⑬他们自然也合伙搞走私。枢密官托马斯·罗爵士指出，1641年间的英格兰，有大批法国

商贩,致使王国货币紧缺! ⑳他们大有可能帮助海员在英国海岸私自运走羊毛和漂白土,并运来烧酒。

贩卖是否属于过时现象?

人们通常断言,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贩卖活动便自动衰亡。这在英国发生于十八世纪,法国则是十九世纪。但到十九世纪,贩卖活动又在英国重新抬头,至少见于一般销售网无力顾及的工业城市郊区。㉑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民俗调查中可以找到贩卖的痕迹。㉒有人认为,现代交通工具对贩卖活动是个致命的打击(这也是先验的逻辑推理)。但马格朗的钟表商使用车辆贩运,到1834年,还心满意足地在莱芒湖使用蒸汽船㉓。应该看到贩卖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手段。每当销售系统出现故障,每当走私、偷盗、窝赃等地下活动有所扩大,或每当竞争、监视等正常商业手段意外地有所放松时,贩卖便又重新冒头。

大革命和帝国期间,法国曾是商贩滋生的场所,请看麦茨商务法庭这位爱唠叨的法官向巴黎商事院提交(1813年2月6日)的长篇报告㉔吧!他写道:“今天的商贩与过去身背包裹的单帮客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虽然四海为家,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但从事的交易为数相当可观。”总的说来,他们坑蒙拐骗,对天真的顾客是灾难,对临街开业的店铺是祸害。为社会安全计,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商业在社会上不受重视,自从革命政权解除禁令和发行指券以后,任何人只要付小笔开业税就能成为商人。这位法官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行会”。他接着补充说,“同时应避免旧制度的陋习”!我们且别作更多的引证。当时做小生意的确实到处结帮抱团。在1813年的巴黎,警察局长被告知,一些小贩当街摆摊,“从马德兰大街直到丹普尔大街”,到处都是。他们毫无顾忌地把摊子搭在店铺门口,不顾铺主的愤怒,零售相同的商品,尤以玻璃

器皿、陶瓷、搪瓷和珠宝为主。维护秩序者对此无能为力：“摊贩不断被赶来赶去，最后又回到原地，人数众多帮了他们大忙。怎么能把他们统统逮捕？”何况他们都是穷人。警察局长又说：“这种非正规的贸易对商人的损害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摆摊出售的商品几乎全都是从商人那里批发来的，小贩往往为他们代销”。^{①79}

从最近的情况看，随着黑市的出现，不正常的贩卖活动在1940至1945年间饥饿的法国再次兴起。在俄国1917至1922年的困难时期，由于时局混乱，流通不畅，又重新出现了倒腾买卖的流动中间商，或用当时人轻蔑的说法，出现了“单帮客”。^{①80}今天，被中央菜场的批发商撂下不管的布列塔尼菜农开着卡车前来巴黎直接出售他们生产的莱蓟和菜花，暂时也可算作商贩。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一些有趣的农民带着成袋的蔬菜水果，网兜里装着活家禽，利用苏联国内航班票价低廉，坐飞机前往莫斯科，他们也是现代的商贩。如果“尤尼普里”这类超级市场的专横统治有一天让人难以忍受，那也难说贩卖活动不会重新泛滥。贩卖归根到底是蔑视既定权威、绕开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秩序的一种方式。

欧洲：交换上限的齿轮

处在集市、店铺、贩卖之上，交换还有其强有力的上层建筑。它们掌握在一些杰出活动家的手里，属于大齿轮和大经济的层次，因而必定也是资本主义的层次；没有大经济，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

在以往的世界里，远距离贸易的基本工具是交易会和交易所，虽然它们并不集中所有的大笔交易。法国和大陆各国的公证人事